

## 大学“书院”教育模式的经验与思考

石井刚 编

丁夕友 李泊桥 李猛 刘建波 孙飞宇

高山花子 铃木将久 柳干康 石井刚 田中有纪 张政远

甘阳 李睦 李震 刘晨 赵晓力

张锦少 著



EAA Forum 21



EAA Booklet - 31

East Asian Academy For New Liberal Arts  
Join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rogram  
b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Peking University

## 大学“书院”教育模式的经验与思考

石井刚 编

丁夕友 李泊桥 李猛 刘建波 孙飞宇

高山花子 铃木将久 柳干康 石井刚 田中有纪 张政远

甘阳 李睦 李震 刘晨 赵晓力

张锦少 著

EAA

# Contents

## 1. EAA 座谈会“书院作为哲学”发言录 (2021.6.21)

1. 甘阳《东亚书院的传统与当下大学通识教育》
2. 李猛《研究型大学与书院制—现代学术的生活方式》
3. 石井刚《哲学、文献学以及无知的教师》
4. 田中有纪《朱熹与书院：朱门弟子的学术活动》
5. 孙飞宇《作为位育的通识教育，潘光旦的本地化》
6. 张政远《唐君毅与新亚书院：私学与官学的三部曲》
7. 赵晓力《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吗？》

圆桌讨论

## 2. EAA 座谈会“书院内外的学问与艺术生活”发言录 (2022.3.16)

第一场 艺术教育进入书院：以新雅书院为例

1. 李睦《从美院到书院的教学》
2. 刘晨《现代文艺复兴人》

第二场 校园内外的生活：以元培学院为例

3. 孙飞宇《田野作为教育：元培学院的社会实践课程探索》
4. 李泊桥《以住宿制书院落实五育并举，实现本科教育的全人培养》

第三场 打造通人：以新亚书院为例

5. 张锦少《广大出胸襟：论新亚书院的通人教育》

第四场“艺”的温故知新：以东亚艺文书院为例

6. 田中有纪《“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论在精英教育中的音乐与体育》
7. 高山花子《作为 liberal arts 的影片制作》

圆桌讨论

## 3. 石井刚《艺以为学：东京大学的“教养”与东亚艺文书院的探索》

---

# 致谢

---

此文集收录了两篇工作坊记录以及一篇论文，皆以“书院”这一古老而崭新的大学教育模式的实践尝试和其背后的理论思考为主题，汇聚了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等机构的先进经验和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的初步探索，从而展现立足东亚面向世界的博雅教育之成就与前景。

东亚艺文书院于 2019 年成立，是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在两校时任校长林建华先生和五神真先生“两校要建立特殊的关系”的共同关怀下合作组成的交流平台——东亚研究联合项目。我们的合作旨在建设立足于东亚区域特色的博雅教育，以阅读经典为联结纽带，共同发展世界水平的人文学术，培养深厚人文底蕴的下一代学人，从而推广以文会友的跨界情谊网络，为人类的和平繁荣作出实际贡献。

当代书院可翻译为 residential college，即住宿制学院。清华新雅书院是结合书院模式和博雅教育的先进事例。北大元培学院在其博雅教育本科学院的基础上致力于建设元培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承继着自钱穆、唐君毅以来的文化精神，是香港高校全人教育的典范。东大东亚艺文书院目前有书院之名而尚无其实，热切希望学习这三所书院的实践经验及其背后的理念思考，故此，2021 年和 2022 年举办了两次工作坊，诚邀各个书院的老师们互相请益。从三所书院参加交流的老师有：甘阳、李猛、孙飞宇、赵晓力、李睦、刘晨、李泊桥、张锦少、刘建波、丁夕友、李震，还有几位前来旁听的老师。我代表东大东亚艺文书院向诸位表示由衷的感谢。唯一可惜的是，疫情阻碍了我们面对面的交流，希望早日实现相互往来，加深友谊。

书院是温故知新的问学平台。它立足于学人的生活，面向开放的未来，打

致谢

造新人弘扬东亚博雅精神。我们的合作刚刚起步，愿携起手来一同成长，共同创造和平美好的未来世界！

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

副院长 石井刚

2023年2月

## EAA 座谈会“书院作为哲学”发言录

发言人：

甘阳、赵晓力、李震（清华大学）

李猛、孙飞宇（北京大学）

铃木将久、石井刚、田中有纪、张政远（东京大学）

**石井刚：**今天的题目是“书院作为哲学”。举办这个会的初衷就是我们要从学术的角度共同展望一下我们书院教育模式的未来愿景。

说起书院，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大陆这几年书院教育的兴起，尤其是清华大学所建立的新雅书院在甘阳教授的领导之下，以通识教育为主，重新激活“书院”这一非常传统的概念，与很崭新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提出新的教育模式。这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教学实践，也是一种学术生态的创新。我觉得意义非常大。众所周知，甘阳教授的实践可以追溯到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

第二，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东京大学 2019 年与北京大学一起建立了东亚研究联合项目，起名为“东亚艺文书院”。该项目北大方面的承办单位是元培学院。他们也在积极推动书院式的教学模式，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和经验。

我还记得 2019 年秋天在北大召开了一次北京论坛。那时候元培学院组织了一个分论坛，主题也是书院教育的模式，与来自日中美各国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办得非常好。

我认为书院教育模式，既是东亚非常古老的传统教育模式，也是近年来重新兴起的新的尝试。当我们要打开新的思路，要开辟新的学术空间的时候，书院模式将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我们构建新的学术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书院就是这样一种平台。我今天希望从这种认识来出发与大家一起想象一下我们书院教育的学术意义和我们今后要发展的方向。这是我们的初衷。

## 1. 甘阳《东亚书院的传统与当下大学通识教育》

**甘阳：**我想讲一下简单的三个想法。第一个，我想讲一下东亚的书院传统和现代大学的关系或者我理解的书院传统和现代大学的关系。第二点，我想讲一下中国大陆最近一二十年来书院教育或者通识教育的一些思想轨迹。第三，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讲一下目前情况下，书院作为教学共同体的多样性或者多元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会受到不同大学传统的制约。

第一个问题我想回到我们现在。我觉得会议宗旨里面都总结得很好，就是提出书院作为东亚文化传统中的共同教学机构。在今天提出在 21 世纪特有的情况下，重建书院教育应该包含传统所没有的当下意义，以及由传统所激起的想象的未来愿景——我觉得这个提得很好。

我简单讲一下我所认为的整个中国和东亚的书院传统，抛开各种具体的差异不讲，应该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共同的特点，用中国的哲学传统术语来讲，东亚的书院教育是比较追求把尊德性和道问学统一起来的一个教育目标。虽然不同的书院，不同的传统可能会各有偏重，有些更重德性，有些更强调问学，甚至有人会认为中国宋代是更重德性，清代学术更重道问学，我想这样的概括肯定是不准确或者比较片面。也就是说，整体来说都是一个追求尊德性和道问学相统一的目标。实际上，我觉得这两个目标不应该作为一个分离的目标，而是作为一个统一的目标。更具体来讲，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在以道问学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尊德性的目标和效果，而不是离开道问学，一味单纯只讲尊德性。我觉得这是我所理解的书院应该具有的一个比较简要的特点，而这一点与西方传统所产生的现代大学有非常大的差异。也就是说，现代大学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大学为模式来建成的。其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以知识为中心。从根本上来说，它也是以西方哲学本身经历了所谓知识论转向以后的一个产业。所以以知识为根本是现代大学的一个特点。

特别是因为在一个现代多元情况下，价值冲突会引起比较大的麻烦，而知识似乎被看成是中性的，所以现代大学的这一传统就变得非常强。虽然大家也要看到，实际运作过程当中现代西方大学也并不可能完全只讲知识而不讲德性。所以我认为，如果单纯强调以知识传授、知识学习为中心甚至为唯一目标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实际的。清华大学在最近这几年把它的基本教学理念概括为三位一体，即：“价值、能力和知识”。在这个顺序中，“知识”排在第三位。当然，这并不表示知识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把“价值”放在第一位。我

觉得这是比较突出了立德树人亦即讲做人、讲德性的一个追求。

在一定意义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现代条件下重新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挑战。因为在现代尤其在知识大爆炸情况下，在一个大学里面每一个学科都面临专业知识挑战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达到尊德性和道问学统一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一代一代的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达成。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刚才石井老师也讲，外头也都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书院教育，有些可能并不叫书院，但是实际上是和以往大学的院系不一样。北大元培学院和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虽然都叫学院，但其方向还是书院。比较明显，这个书院教育在中国是和通识教育的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和原有的中国大学院系教育、专业教育不太一样。其不同就是在于它特别强调了通识教育。事实上，在目前，包括清华、北大、复旦等大学在内，中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相结合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在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背后有两点和中国思想界最近一些年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外面一般很容易忽视这个，所以我会讲一下：一个是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人对中国自己传统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关于前者，以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都在提及西方，但是它的重心主要放在西方的现代和当代方面。但最近一二十年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所有人都会感觉到，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界越来越注重西方的古典传统，特别古希腊的传统。也就是说，不再只是片面追求新的东西，好像以为越是新的东西越好，而是要更平衡地去看西方的整个传统。这种对于西方古典和经典的重视是以往所没有的。关于对中国传统，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全面反传统趋向。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对中国传统基本有一种全面否定、全面批判的意识，而且这种反传统本身形成了一个传统。但是，最近二十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无论知识人也好普通百姓也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对中国经典和传统的认同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这两个思想界的大变化在当今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中都有相对明显的体现。

以往我们在中国经常听到：大学的基本定位就是一个关键词——“创新”。但近年来中国大学至少官方正式的表达都是“传承与创新”。“传承与创新”对本科教育方面尤其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大学教育的功能不仅仅只是创新，还有根本的一点是传承。本科教育的主要任务实际应是传承为主。



这些趋势的形成是对中国通识和中国书院教育相当大的一个促进。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无论在清华、北大、复旦、还是在中山大学，很多老师都可能用一个学期一门课的时间集中读一本重要经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朱熹校订的《四书》。这个都已经非常通常，而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仅是哲学系的专业教育，它实际上成为通识教育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个人对这个走向是比较赞同的。这个并不表明我们完全不注重现代或者当代，而是指以往是很有偏向的。也就是说，我们以往只注重现代或当代的东西，但是对于传统的东西，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包括它的古典和经典，只是少数人的非常专门的学问，而并未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部分。而现在我们会比较强调古典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性。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比较大的共识，至少不会引起很多人反对的是：现代教育应该包括古典教育，古典教育应该成为现代人文教育的重要方面。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古典教育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现在本身。以往那种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单纯地把传统和现代对比起来，而认为现代什么都是好的。这样形成了非常大的片面认知。如今人们在这一点上已经不是那么天真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向。而且它确实对于中国的书院教育和通识教育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古典和经典的文本在书院和通识教育当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当然，我仍然要强调它不是通识教育的全部，也不会说是现代教育的全部。但这是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一个核心方面。特别对于身心健康的培养，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意义，这个是我讲的第二点。

我想讲的第三点，因为我们现在的书院教育都是依托于现代大学，所以它一定会受到现代大学很多制约，这种制约未必都是不好的。比方说，我们讲《四书》也好，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好，按照现代大学的一个学期的方式来完成它，这就会有一定的时间制约。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资源，也有不同的传统，而这些都会对大学办书院形成一种影响。我自己这十几年先后参与了几个不同的书院。最早是200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办的博雅学院。后来大概2013年左右，我在西南的重庆大学建的博雅学院。这两所学院有很多共同点。但是，我2014年参与的清华新雅书院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在中山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博雅学院，学生的来源都是文科的，当然包括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但是新雅书院是在清华开的，而清华是以理工科为特长为主的，所以我们新雅书院的学生从高中上来的时候四分之三都是理科的学生。所以，由于学生的不同以及

学校传统的不同，会带来书院的运行模式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方向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方说，在中山大学和重庆大学所有的课程都是我定的，但是因为进来的都是文科生，而且以后都是文科四年比较完整的教育，也就是通识教育。它在前面两年都没有专业，是一个不分学科的通识教育。后面的两年都会分流到不同的专业，但这个专业非常多样，从艺术学一直到政治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等。无论是哪个专业，都可以造就一些比较好的学生，因为也都在一个共同的人文教育的基础上。这个是比较成熟的。它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方面有它的作用。但是最近几年我和赵晓力老师在清华新雅书院做的很不相同，因为新雅书院是真正的文理学院，我们要同时考虑理工科和文科的学生，而且特别注重理工科学生的通识教育。这是意义更大但难度也更大的工作。我们目前在新雅这一共同通识教育的书院课程主要集中在大学的一年级阶段。二年级他们就要走向不同的学科——计算机、自动化，建筑，经管学院等各个学科。在这样的情况下，课程会有相当大的不同。比方说，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我们可以有比较从容且富裕的时间来打造一个课程。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要把中国的经典化成现代大学一门课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在中山大学提出了一个目标，即希望一个老师例如能用一个学期讲完司马迁的《史记》。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学生能从头到尾读完它。但这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我可以给老师一周四次课的时间，或者至少三次课的时间，所以这个课是打造成功的。我的要求都是从头到尾一起读，而不是读它的片段。我觉得片断往往带着现代人自己的理解和偏见去筛选，不能够达到接近亮点的那种。但是，我希望把《左传》化成一门一个学期能讲完的课，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是，在新雅书院我们不大可能考虑这么奢侈的讲课，因为全体学生集中通识教育的时间只有一年。所以我想讲，书院由于它的大学不同，甚至背景目标的不同，课程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方面，我希望不同的书院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但是归根到底，所有的书院仍然都在努力打造课程。你的阅读材料一定要能够起到你希望它起到的作用，你如何能够成功打造一门课程？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书院教育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困难的地方。

以上三点就是我提出来向各位请教，希望能够一起来讨论的几点。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石井刚：**非常感谢甘阳教授的讲演，关于第三点，不同的大学都有不同的条件或者制约吧。我猜想清华大学也许会有理工科大学特有的困难吧。无论中山大学还是重庆大学，都可以专注于培养人文精神，但是理工科的学生会有不同的要求，尤其是来自工科的知识本身可能对古典的阅读有特殊的要求和需求。所以我请教一下甘阳老师对于工科的学术来讲，阅读古典或者培养古典阅读的感受力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挑战？

**甘阳：**新雅书院的同学虽然上来的时候的背景不同，有的理科，也有文科的，但是在一年级阶段实际上没有差别，他们都读的非常好。关键在于他们在二年级以后大部分的时间要学习他们的专业，比方说计算机、信息、电子等等，所以他们不可能像在一年级的時候那样。新雅书院也有一部分同学学文科，他们这四年时间都花在文科上面的。我觉得在一年级上来的時候理科和文科并没有差别，从我们的经验来说，理科生的领悟力甚至往往更好。唯一的差别是：他们在后面这些年里虽然仍有通识教育课程，但是他们根本的精力是在于专业。清华大学以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为主，所以，我们新雅希望他们能有比较好的人文领悟力和人文关怀。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原先博雅学院所没有的大目标。当然新雅也有文科培养的目标，除了学生可以进入人文社会科学各院系以外，新雅书院内有“哲学-政治-经济”交叉专业专门培养文科的综合性人才。不过我个人觉得，今后的科学家和科技专家非常需要有非常强的人文关怀。这个对于 21 世纪社会特别特别重要。一直到今天，我们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处在科技专家的专制领导下，所以他们对人的关怀，他们对人文世界的理解有多深，有多强，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这是我想。在这一点，目前来说，新雅的教育是比较成功的。关于领悟力，他们都没有问题。对于这些学生的教育，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和课程内能够使他们得到尽可能良好的人文教育，这里也应该包括艺术方面的教育，以至他们今后更加提高领悟能力。

**石井刚：**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还是跟工科或者科学技术有关的问题。现在在新雅书院推动之下，人文的、古典的教育和古典的学术，和当下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了。这么一来的话，会不会发生由当代的科学技术改变古典以往阅读方式这么一个现象？

**甘阳：**这个要看每个老师的不同，因为新雅书院有很多老师来讲的，假定说有一个着重讲人工智能哲学老师来讲的话，可能就会由人工智能这个方向来讲，但是大部分的课，比方说中国哲学的课或者柏拉图的课大部分老师不会从这个方面来讲，所以这个还是取决于老师怎么讲，但是老师的来源是多元的。

**铃木将久：**科学家的话题，尤其今天在这个疫情之下的世界上，我觉得是特别迫切的一个问题。虽然疫情是每个国家都要对付的，而且在对付的时候不能不依靠科学家的支持，不尊重科学根本就解决不了疫情，但是问题在于科学家也必须要有一个人文的关怀。我认为这就是刚才甘阳老师说的意思。目前为止，科学家的做法相对来讲比较人道。那么，如何形成这样的局面？他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从而具有现在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人文关怀？这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很难说。在这个意义上，清华新雅书院那种活动对于将来我们人类世界的意义是很大的。这是我听甘阳老师刚才演讲的一个初步的感想。

**甘阳：**我补充一点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我想现在的科学家的教育和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更不要说更早，都会很不一样。以前的话，科学家不用考虑其他的问题，他考虑的确实就是技术和知识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都会知道任何一个科学家，任何一个科技方面都会和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很紧密。我现在经常和学生讲，以往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我们小的时候科技的发明和人类的日常生活是很远的。发明原子弹、氢弹，这些和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并不是马上进入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大多数科技家并不面对很复杂的人的问题。但是今天不一样，任何一个科技发明都会立即进入人的日常生活，科技的伦理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过。我觉得这是摆在未来科技家和科学家面前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对科技方面的人文教育变得更加重要的一个背景。

**石井刚：**让我说一句我自己的感受：我们经常跟东理工科的老师讨论以后学术框架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老师非常支持我们通识教育的推动和扩大，但是更多的理工科老师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科学技术需要高度的专业化，应该一步一步积累相关的系统知识。从大一开始，数学、物理学、化学那些知识一个个去学，一定要有一套非常系统的专业知识承受的教育体系。所以他们对通识

教育模式的推广是非常有抵触的。我问刚才那些问题，就是想知道清华大学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谢谢。

**甘阳：**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二十年前我们刚刚在中国推动通识教育的时候，理工科的教授们是根本不以为然的，但是它在不断变化，现在绝大多数理工科老师都接受通识教育。但是在哪个课程是通识教育的问题上，每个老师之间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时代在一个大学里面也是一个逐渐形成共识的一个过程，会是一个动态的。老师们，不光是理工科，包括文科也有很多老师认为只有专业才是重要的，也是这么认为的，并不仅仅是理工科，他认为应该一上来就是专业，特别是现在的专业知识都越来越庞大，我觉得是一个过程。

## 2. 李猛《研究型大学与书院制—现代学术的生活方式》

**李猛：**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主要围绕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特点。刚才甘老师也说了，其实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书院，各个大学都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元培学院因为二十年前是北大最早做本科教育改革的一个探索，所以它积累了一些既有的制度特点。今天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里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可能在元培学院这里比较早地感受到了。所以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元培学院所做的尝试，以及具体尝试背后的理念。

韦伯在1917年的《科学作为天职》这一演讲中，讲到美国大学的特点，以及德国大学的美国化。韦伯说，在许多方面，德国大学越来越向美国学习或者靠拢，然后这个发展会慢慢吞没由手工工匠式的学术。他认为这一发展趋势几乎是势不可当的。美国化主要体现在大学体制本身作为科学经营体制，和政府、企业一样，都是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工人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个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拥有才华，但需要借助庞大的实验室、助理和各种资本条件才能进行研究。这在自然科学和工科的研究中是越来越突出的。美国化制度实现了研究性大学中资本和才华的配置。德国大学模式，原来洪堡在德国大学建立的理念，慢慢会被美国化的大学所替代。

这个诊断很有意思。最近四五十年世界范围高等教育的发展或许都印证了韦伯的这一预言。而且高等教育竞争的大规模国际化在各种学术排名都能看出来。比如说，在德国过去二十年的高等教育对理工科进行大力支持，使传统的文科大学越来越衰败，这样的做法也都可以看出国际排名带来的巨大影响。



这个问题在亚洲的大学里也看得特别清楚。总得来说，大学的国际竞争和新技术在新技术方面的核心作用，使大学越来越依赖于资源的投入，依赖的资本化的经营。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这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种大学可能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其整个规模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亚洲的大学，特别是中国的大学，最近在国际大学排名榜上的上升，其实和这一趋势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大学里有关科学研究的方式和态度实际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很值得讨论。我觉得韦伯的诊断当时并不是完全充分。其实大学里面还是有一套单纯的才华社会选拔机制。这个机制是大学的特点。它使资本和才华在这个大学里面能够配置起来。谷歌或者其他大科技公司可以完全自己组织科学研究机构，现在这些机构虽然越来越活跃，但是仍然没有代替大学在整个科学研究中的核心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韦伯也意识到他的预言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工科，在这一方面是非常依赖组织化的资本经营与研究个人才华的结合，但这方面在人文学科是相对较弱的，社会学科是越来越靠拢自然科学的模式，比如说经济学许多学科也依赖大量的投入。人文学科是一个手工业的运行方式，今天大量的人文学科的学者还是靠个人藏书，依赖记忆从事学术研究。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方面的意义我觉得韦伯并没有意识到，我认为他并没有意识到人文学科手工业的学术方式在今天大学里其实有特别特殊的意义。我觉得整个书院制是和人文学术仍然带有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是跟韦伯的说法是有关系的。

我今天说，这种传统生产方式仍然有非常大的优点。今天我们看到人文学者在资本和国际化还有高科技的巨大压力面前是争先恐后地希望把人文学科纳入到这个架构里，希望分享更多的资源。但是人文学术在整个高等体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与书院制的密切关系，恰恰在于它不是一个依赖大量资本投入才能从事的学术，而是每个学者可以把他的个性和人生存在经验来作为主导学术的主要力量。这个方式仍然是我觉得人文学术核心的方式。这是韦伯分析的弱点。

在老式的学院教育中，以1828年“耶鲁报告”著称的耶鲁学院，其实是更接近书院的模式。它是一个以生活为主，培养绅士，培养社会精英这样的模式。我不是说这样一定好。其实在平等的社会状况下，肯定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但是确实是另外一种方式。

现代的大学学术体制的核心把主要以研究为兴趣的教师和希望接受大学教

育的学生通过自由选课制度结合在一起。自由选课这个制度是高度创新性的发明，哈佛学院、耶鲁学院转向现代大学过程中都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制度来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确保了大学同时履行研究性学术与教育学生这两个功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架构。但是这个架构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从老师角度，研究其实是大学的根本特性，相对来说，教学工作反而变成一个附属的副业。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这些研究型大学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创立的时候，都要推动带有研究性的学习为特点的这样一个新的大学教育。这种新的高等教育特点就慢慢替代了传统培养绅士、社会精英的这样一个书院或者学院的模式。那么，在新的模式里头，才华的机制是怎么建立的？2019 年我们在北京论坛的研讨中提到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一流的研究性大学有竞争性学习这样一个机制。这个机制的枢纽是绩点。这些年强调本科科研，而且有一种日益把研究生学习和本科学习混同在一起的倾向。从专业教育方面来讲，中国大学的本科专业教育本来就非常强，但是以前的专业教育基本是苏联模式的，现在的专业教育越来越具有某种类似美国（研究院）的模式：通过竞争性机制，在保研或者其他环节里获得更早被老师发现或者遴选的机会，通过这一机制鼓励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深度投入。这不是完全不好，但是确实对整个本科学习的生态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这个特别大的影响就是整个大学学习生态的逐渐崩解。我觉得这个需要认真研究，就是说，八十年代，我们作为学生的那个时代，有一些非常独特的学习生态，有利于大家节奏相对缓慢的自主学习和相互交往。后来，这个学习生态面对新的竞争性学习机制，遭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整个大学的学术生态环境和学习生活方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概括为以绩点为中心的学习。学生高度关注绩点，而且关注每门课的绩点。我们有一些调查说，学生对 GPA 关注很高。绩点为中心的学习，进一步产生了学生彼此疏离以及焦虑等心理问题。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全国招收了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但是，我们做的调查显示，学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和他们入学的时候相比较，明显下降的就是自信心。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如果看学生的微信，看他的朋友圈，几乎很少看到在展示自己的卓越或自信，其实大部分人在说，自己很弱。这样一个倾向以及特点和我们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看到大学生状况有非常大的差距。我看到过的这种高度竞争性学习的典型就是清华大学一位获获奖的学生的例子：在她每

# Highly Competitive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 Weibo: 10/14/2019)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06:00-06:40 <sup>a</sup>	起床、洗漱、早读 <sup>a</sup>	起床、早读 <sup>a</sup>	起床、早读 <sup>a</sup>	起床、早读 <sup>a</sup>	起床、早读 <sup>a</sup>
06:45-06:00 <sup>a</sup>	预习几代 2、课 3 <sup>a</sup>	预习课 2、大物作业 <sup>b</sup>	预习课 2、课 3 <sup>a</sup>	课 2、预习大物 <sup>b</sup>	预习、晚读、打谱 <sup>b</sup>
第一节课 <sup>a</sup>	几代 2 或 101 <sup>a</sup>	试读、算导 <sup>b</sup>	课 3、一教 101 <sup>a</sup>	课 2 <sup>a</sup>	大物 三教 2302 <sup>a</sup>
第二节课 <sup>a</sup>	课 3 一教 101 <sup>a</sup>	课 2 西附 0 <sup>a</sup>	大物 三教 2302 <sup>a</sup>	课 2、11:10 去吃晚饭 <sup>b</sup>	晨读 西教 4203 <sup>a</sup>
11:25-11:30 <sup>a</sup>	午饭 18 10 某报杂志 <sup>b</sup>	打印资料、午休 <sup>b</sup>	阅读英文新闻、自习 <sup>b</sup>	11:30 去 6# 2128 洗澡 <sup>b</sup>	午歇、自习课 2、大物 <sup>b</sup>
第三节课 <sup>a</sup>	预习几代 2、完成作业 <sup>b</sup>	体育、套题 <sup>b</sup>	阅读英语新闻 4202 <sup>b</sup>	刷剑网 3 220、5 课 <sup>b</sup>	自习 <sup>b</sup>
第四节课 <sup>a</sup>	预习课 3、完成作业 <sup>b</sup>	定投 6A018 <sup>a</sup>	自习自习 <sup>b</sup>	课 3 习题集 4306 <sup>a</sup>	继续上机、东航 9-224 <sup>a</sup>
第五节课 <sup>a</sup>	课 3 习题、业 <sup>b</sup>	晚读、自习 2 作 <sup>b</sup>	晚读、自习 <sup>b</sup>	晚读、自习大物 <sup>b</sup>	晚读、自习大物 <sup>b</sup>
第六节课 <sup>a</sup>	课 3 习题、业 <sup>b</sup>	小说 三教 2301 <sup>a</sup>	阅读 6A103 <sup>a</sup>	课 2 习题集 4305 <sup>a</sup>	自习大物 <sup>b</sup>
20:00-20:30 <sup>a</sup>	每晚预习大物作业、习题 <sup>b</sup>	课 2 作业、试读 <sup>b</sup>	校企合作研讨会 <sup>b</sup>	自习大物(静心) <sup>b</sup>	自习到 9 1 3 回 6 区 洗澡 <sup>b</sup>
20:30-21:00 <sup>a</sup>	听 CNN 英语 <sup>b</sup>	听 CNN 英语 <sup>b</sup>	听 CNN 英语 <sup>b</sup>	听 CNN 英语 <sup>b</sup>	听 CNN 英语 <sup>b</sup>
23:00-01:00 <sup>a</sup>	洗澡、看新闻社工 <sup>b</sup>	自习、追求高效 <sup>b</sup>	自习、追求完成任务 <sup>b</sup>	自习、平心静气 <sup>b</sup>	自习、用电脑社工、sleeping <sup>b</sup>
01:00 以后 <sup>a</sup>	sleeping <sup>b</sup>	sleeping <sup>b</sup>	sleeping <sup>b</sup>	sleeping <sup>b</sup>	sleeping <sup>b</sup>
特别高强度日 <sup>a</sup>	高效、	加班 1 <sup>b</sup>	高效、专注 <sup>b</sup>	课 2 大物内成 <sup>b</sup>	课 2 大物；金融社工 <sup>b</sup>
学习倦怠 <sup>a</sup>	认真对待大物、	预习课 2、大物 <sup>b</sup>	课 2 刷题 <sup>b</sup>	加班 1 <sup>b</sup>	静心、思考 <sup>b</sup>
社会精英 <sup>a</sup>	想读研、在 3 作业 <sup>b</sup>	认真读研 <sup>b</sup>	创业、过苦训练 <sup>b</sup>	练笔玩 3a 好看 <sup>b</sup>	家书宣传、使命、笔迹 <sup>b</sup>
体育训练 <sup>a</sup>	洗澡、	认真上体育课 <sup>b</sup>	=====	=====	认真读研 <sup>b</sup>
生活状态 <sup>a</sup>	自律、自律 <sup>b</sup>	积极平和 <sup>b</sup>	积极、自律 <sup>b</sup>	积极、平和 <sup>b</sup>	积极、平和 <sup>b</sup>
精神品行 <sup>a</sup>	礼、谦、汗 <sup>b</sup>	奔奔如水的勇毅 <sup>b</sup>	知胜者、谦知心先 <sup>b</sup>	为青春喝彩 1 <sup>b</sup>	谦虚、少言、力行 <sup>b</sup>

周的时间表上，几乎每一个小时都有详细的安排。这也是整个大学学习越来越像投行和律所等职场的生活方式的例证，也是一个高度理性化且富有竞争性的安排。元培学院这些年努力希望重新打造学习的生态。围绕一个竞争性学习导致的彼此疏离和焦虑，元培学院希望努力做到能够培养一个学术的生态和生活的共同体，让学生在这里面能够探索他的个性。“尚自然展个性、化孤独为共同”。这是我们去年毕业典礼的时候介绍的蔡元培先生的两句话，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把元培学院打造成有共同交流，较少彼此竞争心态，建立沟通管道，减少疏离感的一个共同体。这是我们的基本想法。在这里，有几个主要的环节。其中的一个就是元培教育有自己的小型通识教育体系。我们也建立了系统帮助同学适应大学教育的新生教育体系和跨学科的学习制度。我们希望既重视元培既有的强调自由选择的一面，同时也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结合的共同的关联。让我在这里引用一下一个学生的感言：

“我的确该感激足够的运气，让我多少能践行一点理想主义的大学生活图景。我个人真的没有体会到如此极端的无谓消耗。我选课一定是优先考虑课程的内容、质量和老师的风格，除非因为老师不公正，否则我并不刻意避免给分所谓的“雷”；我在学习上的投入取决于我自己的兴趣和能得到的真正收获，所以我可以一周花 10+小时在 3 学分的《理想国》上、花 10+小时在 2 学分的心理统计上，而 5 学分的高数只是按部就班。出分，只要是个公正的成绩，我就觉得心甘情愿；只要学有所获，我就觉得课有所值，因此迄今分数最低和第二低的心统 I 和心统 II 却让我挺有成就感。我在山鹰社参加一个又一个队



伍，投入得越来越多、承诺得越来越多，它也带给我大学以来最宝贵的成长；假如以放弃这些经历和成长为代价，保证我大学所有课程上优秀（85分），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我绝不是不在意成绩，我只是真心实意地（不只是理论上）觉得只有成绩是没有意义的”（元培学院 2019 级心理方向岳同学）

岳同学是一位心理学方向的孩子，她加入了北大山鹰社。去年秋季学期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北大清华这些学校学生内卷的文章。这段话是她在朋友圈里对这篇文章发表的感想，我当时觉得写得非常好。她现在是一位大二的学生，她的大学生活与这样以绩点为中心的内卷化学习是非常不同的，她并没有太在意绩点，虽然她成绩也不错，但她考虑学习的投入时不是以学分和绩点为标准的。比如她上元培的通识教育课《理想国》，一周花了 10 个小时在这门课上，这个对成绩帮助不大，但是她会在这上面投入很多时间。她在大学的成长与她在山鹰社这个社团里面的生活大有关系。而且她判断整个学业的时候，主要不是按绩点考虑的标准。她称之为叫做“理想主义”的大学图景。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实，我认为这个“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我们作为书院应该给这样的大学图景创造更加完整的生活空间和学习空间，这样每个人都会在里面找到她学习的位置，能够赋予她的学习和生活以意义。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书院建设最重要的。

整个元培学院的学生很早就集体入驻在 35 楼。我们希望能够把 35 楼从住宿的空间，改造成一个学习交流和生活空间。我们不仅有住宿辅导员的设置，而且还开设了大量的书院的课程。这些课程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生出面动手、组织、合作，让他能够在这里面感受到他自己全面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让这些学生能够从书本和绩点中稍微跳出来一点，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巨大的，多方面的潜力。



最后这些图是我们做的一个古琴的文化节。右下角照片这个学生来自内蒙古。她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背景，就是上了一门古琴的课，后来觉得这个可以在书院里面做一个活动，然后找到我们。我们支持她。她去联络了相关的老师。我们就在学院做了这个活动。我觉得她在书院里获得的成长，不仅作为一个职业作为技能的培训，而是全面的成长。这个孩子在大一的时候，我就认识她，那时候，是一个有些青涩的孩子，从内蒙的旗里过来，非常朴实，但是这三年成长非常快。这是我们希望书院在整个研究性大学的这样一个竞争性学习中重新塑造一个空间，通过通识教育的人文学术，也通过书院的共同生活，希望给学生提供不同教育的可能，这个大概是我们希望的一个想法吧。

**田中有纪：**我以前在北大哲学系留学，当时就觉得元培学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学生们的条件也挺好的，特别是宿舍的条件。如果我是学生的话，一定会羡慕元培的学生的。我听说进元培学院的学生分数很高。元培是一个比较难考的系吧？如果是，我觉得那里的学生比较有自信心才对，不需要再培养自信心，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也没有自信心吗？

**李猛：**确实有这个问题。不光是元培学院的学生，如果你是北大或清华的学生，校外的人都会认为，你们这个学生是状元，怎么还会没有信心呢？但当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在一起时，其实他们彼此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的学生，尤其这些通过高度竞争进入到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们似乎把人生的一切都赌在了学习上。我和许多学生交流时发现，元培学院的学生都很出色。这恰恰给他们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周围都是学霸，都是状元。有些学生的能力，比如艺术修养、出国交流等等各方面的能力，比起我们这一代人都非常强，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他们所有的能力中最核心的东西——对于自己的热情、从事一项事业的渴望等，这些东西有时很弱。有时候你很难想到这么优秀的学生，动不动就会产生高度焦虑、自我怀疑，甚至完全丧失生活的动力。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缺乏对生活的热情。现在我觉得整个书院的培养，最重要的是投身生活的热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田中老师说的没错。他们就是中国最出色的，太出色了，而且很可能在过去的十年中都受到父母和老师的高度爱护，使他们进入到北大，进入到最好的学府。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反而缺一些生活中其他的东西。如何让他们觉得读书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们说亚洲学习方

式有它的优点，但是我觉得在某些地方这种学习方式也有一些需要面对的困难。

**石井刚：**您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手工匠人”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手工业式的学术方式是人文学科研究的特点。如果跟甘阳教授的讲演结合起来想的话，大概是19世纪知识论转向以后，不管是人文学科还是理工科，都是注重理性的运用或者理性化知识的运用。人文学科的老师反而忘掉自己“手工业”的这么一个人文学科本来应该有的特点。您一开始提出手工匠人这个说法，我非常有感触的，而且让我来阐释一下，这个大概跟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是有关系的。我的问题是：现在在元培学院里面如何去培养学生的这种手工业式的或者身体化的知识？说“知识”可能不太恰当，比如说“修养”？

**李猛：**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我们在书院里要让老师和学生能够密切交流。比如说我们涉及的新生教育，特别是新生讨论课，主要想以这个方式来做的。现在我们有些非知识类的课程的重要性越来越高。非知识类的课程，就是动手的，像你说身体化的。比如说，新雅书院有一个下乡劳动，也就是上山下乡的活动。这个我非常欣赏，但是我们元培学院学生比他们多很多，所以这个不太容易做。我们也希望下一步是不是在劳动方面的课程做一些尝试。这个需要打破现在的课程类型。社会实践和劳动确实对人的成长非常重要。但怎样能够真的让学生通过劳动有收获？至少你劳动的时候是要放松的。它也不是那种高度竞争的。因为你也不是靠种麦子使你谋生。所以劳动有游戏的色彩。这个方面仍然是学院可以多做的。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些努力，整体上并不是很乐观。整个大学模式是研究性大学，我们都在研究性大学里面谋生和工作。也就是，我们现在手工业者和机器生产在一起，机器生产占据支配地位，手工业只是调剂。我希望能够保护住手工业的这个心态，然后慢慢寻找和机器结合的模式。我完全同意甘老师的看法：整个研究性大学不是没有优点，不是没有好处的。而且竞争性的学习对于中国的学生，对于亚洲学生来说，也有它传统上原有的优势，而且，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机制也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并不是要取消这种竞争性学习，这样做有很多危险。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怎么在里面加入一些别的东西，让他们磨合在一起。我们的通识课比较成功的确实都是人文色彩的。中国古代史、《庄子》、《理想国》等等都是。科学方面的通识课还有很多困难。科学的通识课，上得比较成功的就

是一种普及性质的，专业性弱一点的课，很难做到真正像文科的通识课。但是，就像甘老师说的，即使文科这一类课程，比如说我们上《庄子》这类课程，也要高度依赖老师。当然，这也是人文手工艺人的一个特点：你找不到工匠，就是做不好；你说手工的好，但是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机器做的好，机器至少实用，比较标准。我们一流大学的优势是我们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老师，劣势是这些老师今天都非常忙。我们需要在大学体制里为老师和学生找到一定的闲暇的空间。这个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也许我们几个学校在一起。大家都比较赞成国际化，我们也可以把某些趋势结合起来，让他们打造出一些或者摸索出一些新的空间来。

**甘阳：**我觉得李猛太乐观了。现在我们看文史哲，因为文史哲在一个现代大学里面往往有很强的自卑心态，觉得它自己不够科学，不够现代，所以咱们老是说了解历史学的同事强调历史学不是人文学，是社会科学。在美国历史学院很多都是在社会科学部的，包括原先服务过的香港大学历史系都不是在 Humanities 而是在 social science division。哲学现在更是想把自己科学化，最好让科学技术人士都认为哲学对人工智能科技很重要。不这样的话，它就觉得它没有地位。这都是自卑心理的表现。唯一剩下来好一点的就是文学，当然文学有文学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不敢乐观，可能并不比科学技术更不异化，甚至更异化。但是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书院的模式恰恰有一定的作用，书院并不仅仅在教育学生方面能起到作用，而且它实际上给老师们一个新的教学可能性。比如说，在我们新雅书院，以及李猛的元培学院，绝大多数老师都属于各个院系。也就是说，这些老师一方面在专业院系，比如说在哲学系给学生上课，但是同时他们也给书院上课。书院上课的特点就是这个学生不是属于他们专业的，是各个专业的都有。我发觉在新雅这里，很多清华大学的老师特别愿意给书院的学生上课。其一个理由是比较强调小班教学，比较容易恢复到一种更自由的状态，不需要首先考虑如何专业化。有时候会让他意识到他是一个人文学的老师，不是给学生提供一个专业的教育，而是一个人文教育。我觉得这是书院一个很大的功能。不管是年轻老师还是很多资深教授，他们都很愿意给新雅书院的学生上课，往往觉得这些非专业的学生，比他们自己专业的学生还要好。正因为我们书院的老师大部分并不是书院的老师，而是出于各个院系。如何营造学术共同体？不仅仅是学生，而是把这些老师凝聚成一个共同体——这是书院特别要走的路，而且这也是比较自然形成的一个方面。

### 3. 石井刚《哲学、文献学以及无知的教师》

**石井刚：**首先我想从哲学这个概念开始讲。哲学有很多种意思，很难下一个明确的界定。我想借用的是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的想法。他把哲学定义为“做哲学”。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轴心时代。那么轴心时代就是世界各地产生的哲学。为什么那个时代在世界各地几乎同时产生了哲学这么一个思想的方式？是因为那个时候都面临着一种临界状况，也就是人类生存的危机，面临自己在生存危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想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为什么存在？我们人如何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这么一个危机意识促成了哲学这么一个思想的方式。那个时候的人们发现人作为人能够存在，且这是高级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人可以思考或者人可以做哲学。这是雅斯贝尔斯的想法。所以雅斯贝尔斯对人类发展的方向比较乐观。人之所以人是因为我们互相可以认定对方为人。这是他坚定的信念。人之所以为人也是因为人可以做哲学，这是出发点。

我们东亚艺文书院的中岛隆博院长，和纳富信留教授一起在推动《世界哲学史》丛书的出版。那么，他们俩在一个对谈里面讨论世界哲学是什么。我想挑一些内容来介绍一下。

纳富信留说，现在我们需要哲学的世界化是因为我们要克服内在于哲学的危机，也就是说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哲学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寻找概念和语言，能够使人重新邂逅世界。他们的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走到尽头的问题而已，西方哲学走到尽头等于是我们现在已经失去面对或者如何去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了，所以要动用世界各地的哲学，重新建构哲学。这是世界哲学的一个意图。在这里当然会出现翻译的问题，如何打通不同的语言之间做哲学的愿望和主体的努力？他们认为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而且翻译本身是做哲学不可缺少的环节。纳富说：哲学的普适化是一种翻译的运动，而不是要建立单一的哲学话语。当某一个文化中的思想翻译介绍到另外一个文化的时候产生的运动本身是普遍性的基础。换句话说，翻译的过程，或者翻译的努力本身是哲学要付诸努力的方向，甚至是哲学本身。这是他们世界哲学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下一个环节是哲学和文献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我做中国哲学的出发点是研究清代的戴震以及晚清学者对戴震的诠释这么一个问题。清代学术一般被认为是文献学。文献学和哲学被认为是相对立的。文献学就是 Philologie 或者是 Philology。为什么我们把 Philologie 或者 Philology 翻译成文献学？这里



可能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回到 Philology 原来的意思就是 Philo-logos, 就是对逻各斯的爱。所以要把它翻译为文献学的话, 可能就是意思有点窄化了。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的时候活跃的一个德国学者贝克 (August Boeckh), 是建设文献学的代表人物。他是这么说的: “在我看来文献学本来的目的在于认识人类精神所产生的事物, 也就是认识被认识到的事物。” 也就是, 对于认识到的物的重新认识是文献学本来的目的或者是 Philology 本身的目的。再说, 文献学和哲学是相互制约的。他说: “人的认识无非就是要认识到被认识的事物, 若对他人所认识到的事物没有认识, 则无法得到认识。” 也就是说, 哲学是一个认识的过程, 然后才有把认识的东西再表达出来的一个语言活动。那么, 哲学的基础首先要有一个认识, 这个认识还是 Philology 的一个工作, Philology 和哲学如果有一方缺少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成立。没有哲学思维的话, 文献学对于认识的东西重新认识的过程也不可能成立的。没有文献学基础的话, 哲学的思考可能也没有办法成立。所以文献学和哲学其实也是比较相近的, 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一对东西, 这是我所理解的贝克的意思。

接下来再回到清代学术。以色列学者 Ori Sela 认为清代发生了“文献学转向”。他说: “18 世纪中国并没有称作‘哲学’的学术范畴。我在本书中追求的并不是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康德?’ 也不是像变魔术般地把康德从 18 世纪中国拿出来给你看, 而是要了解和哲学无关的历史人物对什么加以关注, 什么问题对他们重要。尽管如此, 没有哲学范畴并不等于他们对超出文献学的任何问题无动于衷。相反, 文献学被广泛认为是走向‘得义理之真’以及‘治天下’的重要基础。” (Ori Sela, *China's Philological Turn: Scholars, Textualism, and the Dao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

虽然明末有艾儒略翻译西方学术体系的时候, 把 Philosophia 译介到中国来, 但是哲学概念在当时对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 仍然是陌生的。所以 Sela 的这一说法是成立的。至于文献学, 当时有艾尔曼 (Benjamin Elman) 所说的 philology, 或者“朴学”。而清代朴学里面有一个关怀。它其实是非常哲学化的。正如 Sela 所观察到的。但是这个不一定能够直接把它称之为哲学。至少 Sela 并未采取这种哲学化的径路。无论“得义理之真”也好, 还是“治天下”也好, 都是为他们致力于朴学工作而奠定的基础也是治学的目标。这是 Sela 的说法。

一提到清代朴学的哲学性质问题, 我们自然会想起戴震说非常有名的一句

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是考据学的方法论问题。那么，他做经学研究，目的是要了解“道”。这个“道”很重要，因为“道”有时候被翻译为逻各斯，或者逻各斯翻译成“道”。如此一来，Philo-logos 的概念和戴震的考据学方法可以融合起来。戴震的方法本身就是从音韵训诂开始寻求“道”的考据学功夫。这种目的和方法本身其实是非常 Philological 的。那么，这个“道”也是我们哲学所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或者是目标。在这一点上文献学和哲学 Philology 和 Philosophy 有贯通的可能性。若以贝克的观念来讲的话，哲学和文献学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制约或者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是我对哲学和文献学这两个概念比较粗浅的了解。我们现在在东亚艺文书院里面做本科生的教育，推行阅读古今东西的经典。我们要求同学们 close reading，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文献学的教育。它的背后还是会有对逻各斯的关怀，这是没办法否定的，而且也不应该否定的。所以说通过这么一个方法要建设或者要培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价值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再和法国思想家朗西埃在《无知的教师》中对人的定义结合起来再阐发一下。他效仿笛卡尔的“吾思故吾在”，说“吾意故吾在”。他说，人首先有一个意志，就在“凡人都有意志”这个意义上，人是平等的。这个意志就是求知的意志。所以，他认为人与生俱来的知性就是意志的体现。人要了解世界，要了解周遭，这种欲望，朗西埃叫做意志，也就是人本有的秉性。但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这个意志逐渐地受到管制和约束，师生关系遂变成不对等的等级秩序。所以他说，人的知性是要解放出来的。按照他的观点，现代的教育是要逐渐剥夺人的知性、人的意志的一个过程。他非常反对从老师到学生单方向传授知识的这么一个教学模式，而主张要解放学生原来就有的求知意志，让他们习得主动面对学术的态度。他说人是“仔细审看所看到的事物”的存在。这个说法和贝克有关文献学的定义方式是非常相似的。强调人的意志或者是人的知性，在朗西埃那里，完全被等同于去认识被认识到的东西的那么一个知性过程。朗西埃乍看上去是非常反文献学的态度，但实际上，他所提倡的做法是非常 philological 的方式。也就是说，philology 完全可以为解放人的知性服务，或者说，我们在书院式阅读经典的学习实践当中，完全可以解放我们本来的意志。新的书院教育也应该本着这个方向去摸索新的教学模式。

朗西埃也涉及到翻译的问题。他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能够成立是因为他们是人，也就是说，因为相互之间必然会有区隔。”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

人和人之间有区隔，所以人才能够与他人得以交流。或者说，有区隔的人聚在一起，才会出现交流。他接下来还说：“语言不会使人们团结为一。反而，语言的任意性迫使人们加以翻译，并使得他们互相体察互相所付出的努力，同时也让他们行使共同的知性。”通过翻译来相互体察每个人的努力，为理解对方所付出的努力。这种共同努力才让他们发挥他们共同的知性。这个说法也非常有意思，而且有助于理解我们东亚艺文书院为什么以三语模式进行教育。我们要靠英语，有时候也用汉语或者日语，去进行同学们之间的交流。首先我们有语言的区隔。我们需要翻译才能够了解对方。为此双方都要付出同样的努力。我们也鼓励他们努力来理解对方。我们的沟通，我们的交流并不是透明的，也不是没有障碍的，而是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身是充满隔阂的，充满障碍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限性的语言来试图了解对方，试图共生在一起。

最后我想说：2020年我们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新冠肺炎世界性流行的情况下，我们的交流受到严重的阻碍。在此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推动我们的工作要往前走？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且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是自己能够完成的。我非常热切地希望和世界上的志同道合的老师们一起努力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其目的无非就是加强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别人处境的困难，相互承认彼此的努力，在这么一个维度上，促进学生们的友好交流，让他们加深彼此之间长期的友善情感。这也是文献学和哲学共同要求我们去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甘阳：**我提一点问题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文献学 philology 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翻译的问题。我认为两者之间恰恰是有张力的。比方说，石井老师刚刚的翻译比较强调的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翻译。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古代和现代之间也需要翻译，即使是同一个文化传统。比方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要美国的学生读英文翻译的古希腊文、古罗马拉丁文的文本，因为如果不做这翻译的话，事实上古希腊的传统是无法进入现代美国的。而这一点，我觉得，同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国大学当中也变得非常困难。比如说，我们要教《左传》、《诗经》，我们所有文史的老师都不认可现代翻译的文本。这也导致《左传》、《诗经》、《汉书》等文本很难进入，很难被掌握成非专业大学生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个时候老师都强调文献学的问题。这样就变成一个专业体系，也就是你先要在专业的语言上花很大很大的功夫。假如说，在中国或者日本，如果



你要强调学生必须要用古代汉语读《诗经》、《左传》和《汉书》这一类，就意味着所有这些经典都不可能转化为现代思想之内。但我们在通识教育方面，有时候碰到很大的问题。这个背后仍然是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张力。也就是说，我刚才在李猛老师发言的时候曾说，人文学的教师并不比科技学界更手工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找过很多老师讲《左传》。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左传》专家，但是他们只能把《左传》当做考古系的专业需要或者是做上古史的专业需要。《史记》也有这个问题。绝大多数都不会把它当做一本书来读。这样的话，我认为经典实际上就失去了它的准确意义，而人文教育的准确意义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问一下石井老师：东大这边，日本这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比如说学生读的是现代日语的翻译还是怎么样？您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麻烦？

**石井刚：**我们东大东亚艺文书院负责本科生教育。我们现在的教科书的经典并没有涉及到中国古代文本。最大的原因当然也是您所说的，我们很难去读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如果我们完全忽略两千多年的经学解释传统去看那些经典，可能我们就是半懂不懂，或者会产生很致命的误解。当然《论语》之类在日本广泛流通的经典的话，也有日本自己的诠释历史。这个比较好说。但这个只是我们以当代的目光走进经典的世界。这一点一定要让学生知道。我们要走进经典，我们很难离开我们当下的处境。

我们也要跟专业教育结合起来。拿中国哲学的传统来讲，如何对待经学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一直认为1905年科举废掉之后经学不会再重新崛起了，但看最近的趋势，我感觉并不是那么回事。也许我们更需要新的经学。因为经学是对经典诠释的不断积累、不断诠释的过程，所以未来也会有经学。如果这样，我们就要重新以当代的眼光解释或者重新进入经学的传统。比如说北宋、南宋的时候出现的所谓 Neo-Confucianism，然后到了清代又出现清代考据学。这些每一个重要时代的重要经学诠释都植根于当时的世界观，每次新的范式出现，都经历过根本性的转换。所以经书的读法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读法。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新世纪的经学，这是我们需要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但这个问题至少目前不是我们东亚艺文书院所注重的。我们只是为初学阶段的本科生提供走近经典世界的机会。

#### 4. 田中有纪《朱熹与书院：朱门弟子的学术活动》

**田中有纪：**我首先介绍一下 CCTV 的节目，是在 2020 年 8 月播放的《大儒朱熹》。很多有名的理学专家参加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如实反映现在理学研究的动向。其中书院的介绍引人注目。节目第三集叫“大道集成”，介绍著名的鹅湖书院。本集首先介绍一个活动，是叫做“朱子之路”的研习营活动。这个活动以朱子学传承与创新之旅为主体。在鹅湖书院里师生们静坐舒心凝神，体验古人澄心默坐的修身方法。这个节目也介绍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哲学大辩论——“鹅湖之辩”。

该节目接着介绍朱熹通过书院里的讨论把自己的思想进行消化的过程。比如说，他和陆九渊的讨论是在鹅湖书院，和张栻的讨论要么在城南书院，要么在岳麓书院进行，和吕祖谦是在寒泉精舍，和陈亮是在五峰书院。朱熹自己也在晚年建立了武夷精舍以及考亭书院。诸如此类。

我根据徐伟和涂怀京的《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第 3 期，2007 年 5 月，第 61-64 页），介绍一下关于南宋书院的比较新的研究。在中国书院史上，南宋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期。福建以闽北地区的发展尤为突出。比如说，云谷书院（寒泉精舍），紫阳书院（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竹林精舍）。乾道五年（1169 年），朱熹母亲病卒。次年正月，朱熹将母亲葬在建阳崇泰里的寒泉坞。距离朱熹所住的潭溪有一百余里，往返不便，于是，他就在离寒泉坞不远的云谷建造了三间草堂，匾曰“晦庵”。寒泉精舍的落成标识着朱熹生平中一段重要的讲学著书时期的开始。

那么，书院的意义为何？朱熹在闽北书院的二三十年里，以联友带徒的方式完成了《易学启蒙》、《中庸或问》、《西铭解义》等等一大批著述的撰写、修改以及校订工作。朱熹所建书院依靠讲述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使学员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比如说，朱熹和陈亮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对立没有消除，但是考亭书院的相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教学对象上实现门户开放，所以朱子学作为一种理学文化的新潮迅速由地方向全国发展，由民间渗透到了官方。朱熹采用了问难论辩方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自学和研究能力。

接下来，我讲一下朱熹和他的老友蔡元定的学术交流。蔡元定，字季通，是在音乐研究上比较重要的人物，是建阳人。建阳离寒泉精舍、竹林精舍都很近。所以他和朱熹发生学术交流的机会自然就很多。再者，他的父亲蔡发住在

武夷，也是朱熹晚年建立武夷书院的地方。《宋史》也有记载说：“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

他们的交流在朱熹建立寒泉精舍的时候开始了。蔡元定写了很多术数书。其中以完整的形式流传至今的只有《律吕新书》。那么，弟子们在书院里怎样理解了蔡元定的音乐理论呢？朱熹对弟子们怎样解释又复杂又麻烦的理论？从理学的音乐思想来看，在书院里的讨论内容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律吕新书》是由朱熹和蔡元定合订的。他们把三分损益法提高到理学的正统乐律理论。三分损益法就是用2比3的振动数比完全五度和3比4完全四度的谐和音程的音阶。那么，在《朱子语类》卷92中，有一段问答：“问：‘季通律书难晓。’曰：‘甚分明，但未细考耳。’”接下来，还有问及空围以及其他六管的问题。这是比较麻烦的问题。顺便说一下，《朱子语类》记载了朱熹和弟子们在书院问学的讨论内容，南宋时期书院活动的实际情况在此书中也可可见一斑。

对于发问的弟子来说，如上理论问题还是比较难。在《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非常认真地解释那样复杂的内容。我可以这样说，朱熹在这里实际上扮演了蔡元定翻译者的角色。《朱子语类》中又如此说：“季通书来说，近已晓得，但絃定七弦，不用调弦，皆可以弹十一宫。如此，则大吕、太簇、夹钟以下，声声皆用按徽，都无散声。”“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意思就是，如果按照蔡元定所说的方法，要用一弦来弹所有的音律的话，没有散声，所以对弹古琴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朱熹在这里对蔡元定表示了不满。朱熹重视实践的音乐，而蔡元定偏于理论。朱熹在别的地方也说：“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於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接下来：“笑云，如此议论，又欲似在乐不在德也。”在这里，朱熹在说，我们讨论正确与否的时候，应该专注音乐的是非，要看统治者的道德性。按照儒家传统，音乐象征着皇帝的权力，音乐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所以音乐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朱熹自己当然也认为音乐的目的就是移风易俗。但是，我们也看得到他试图阻止弟子们极端重视音乐和道德关系的倾向。所以，他还是要要在音乐与道德之间保持平衡。

我们继续看一看《朱子语类》卷92《乐（古今）》中的记载。朱熹说：“洛阳有带花刘时，名几，於俗乐甚明，盖晓音律者。”他也说：“向见一女童，天然理会得音律，其歌唱皆出於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可见，朱熹一方面重视儒家的音乐理论，一方面重视俗乐的音律。他很重视自然，在刘几

和儿童的音乐中看到了自然之理。

综上所述，蔡元定在《律吕新书》中提示的理论和朱熹在《朱子语类》中透露的对音乐的看法不是完全一致的。理学正统的理论表现在《律吕新书》上。可是，朱熹认为该书对于弟子来说比较难，甚至还有给弟子带来误解的可能性。《律吕新书》是朱熹和蔡元定要么在书院直接讨论，要么通过书信往来切磋的成果，但还是受蔡元定影响的可能性更大，有可能失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平衡。所以朱熹的思想不等于蔡元定的思想。我猜想，朱熹希望在书院里继续把他的理论弄清楚，并要阻止弟子们误解他自己的理论或者夸大解释。那么，朱熹和弟子们在书院中的活动结束之后，理学的理论怎样变化呢？朱熹去世之后，《律吕新书》所展示的音乐理论，果然有时候被误解，也有时候被夸大解释了。

我介绍一个误解的例子。有朱熹后学认为，朱熹不重视音乐实践，说朱熹作为儒家讨论音乐有点偏向理论，并未提出一般的人们也可以理解的比较简单的音乐。至于夸大解释，有些朱熹后学认为，朱熹特别重视易学和律吕的密切关系，因此，三分损益率也有可能不适合他的深奥的易学思想，作为后学，应该寻找三分损益率之外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和朱熹的本意完全不一样。

最后，我大胆想象一下：朱熹为什么需要书院？对他来说，为了了解弟子们怎样理解他的思想，从而确认他可不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正确地传达给对方。为此，书院的确是必须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书院，只有书籍或者书信，则不能把自己的所有思想完整地传达给弟子们。我想，朱熹通过和弟子们的对话，有可能获得了一种保持平衡的态度。音乐的确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意义，但是音乐不能决定所有的政治命运，音乐的确需要理论，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民间音乐的实践性。之所以朱熹在学术上如此能够保持平衡，我觉得是因为他有书院这么一个平心静气讨论学术的场所的缘故吧。学术上的平衡态度也就是朱熹学术的特征之一。书院或许造就了他的这一特征。也许朱熹常常发现弟子们的极端的态度，才返顾自己，更注意自己保持冷静平衡的学术态度了。

**石井刚：**朱熹认为书院是必不可少的，对他的学术传播角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传播自己的学问，必须要依靠身体性。那么，身体性或者是分享一个空间，为什么可以保证知识的正确的传达？

**田中有纪：**朱熹认为书院是必须的。我看他很喜欢在书院里面的活动，他很喜

欢看弟子们的态度，甚至喜欢他的论敌的态度。在书院中分享一个空间，弟子们可以看到朱熹的表情或者朱熹的反应。如果只在书中写他的理论的话，弟子们应该不能完全理解朱熹的思想以及朱熹对学术的态度。比如说，在儒家思想中音律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朱熹也当然对音律有兴趣。但是在《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讨论复杂的音律的时候突然笑出来的态度。儒家的音律理论的确是重要的，但是音律不等于音乐，我们演奏音乐的时候，如果只考虑复杂的音律问题而不知道具体的演奏方法，音乐不能成立了。在他笑出来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非常平衡的态度，他一边讲理论，一边看实际。这种态度，如果没有书院的话，弟子一定看不到。听说朱熹和张栻在书院里讨论之后，来听的人挺多的，但是因为太多了，有些人进不去屋里。所以有的人在外边听着朱熹和张栻在书院的讨论，但是，讨论的内容他们不可能听得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即使他们听不到朱熹和张栻的讨论，亲自去那个地方参加讨论仍然也很重要，重在共享一个空间。另外，一般来说，陈亮的思想和朱熹的思想本来完全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关系。虽然他们的看法不能完全一致，可是他们的关系很好，所以他们尽量把他们的看法接近一下。那么面对面的关系对他们的思想的构成一定有很大的影响了。如果认真看朱熹本人的思想，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他很重视在书院里面的活动。

**李震：**朱子或者整个理学传统当中，音乐教育到底有怎样的功效？这个功效又是怎样落实到书院当中的？换句话说，它到底是常设型的课程还是更加个人随意的一个情趣？

**田中有纪：**朱熹的理论都在《律吕新书》中。朱子后学除了音律方面之外，还要看朱熹所留下的所有的书。也包括《朱子语类》在内。所以，朱熹《律吕新书》中的思想对后学的影响固然很大，但是影响更大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在书院里面的所有的活动。

## 5. 孙飞宇《作为位育的通识教育，潘光旦的本地化》

**孙飞宇：**我是最近花了一段时间来集中读潘光旦的工作，最初的想法其实是有其他的研究性质，但是后来阅读发现，潘先生大量的工作其实是跟通识教育，跟大学教育是相关的，我正好因为在元培学院工作，有很多思考，所以我就



带着我自己的问题写了一篇关于潘光旦先生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研究。这个研究最初是从“通识教育在中国”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思考入手的，这是一个入手的点。另外一个点来自于我本人的学科背景，因为我是从社会学出身的，虽然我的工作很多都是社会理论和学科之间的交叉。但是在元培学院工作的这几年，我越来越认识到实际上社会科学当中尤其在经典工作里面有诸多的研究跟思考，跟我们今天通识教育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成为今天思考通识教育非常丰富的资源，但是到目前并没有发掘这样思考的资源，所以我也希望从潘光旦先生的工作开始，我能够做一个一系列这样的讨论。我今天的报告集中在潘先生的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创立有着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的这样一位社会学家。

其实他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的工作不仅仅集中在社会学研究。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我们今天可以非常清楚地考证到通识教育这个概念其实是潘先生最早的创造，他讲了这个概念大概一年之后才读到了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红皮书，他整个的通识教育基本的理念跟他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是相通的，他在社会学研究当中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中和位育”。这是来自于《中庸》的讲法，就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他从1913年到1922年在清华读书，1922年到1926年在美国留学，此后回国，回国长期任教并且很长时间里面是在清华任教，曾经担任过清华的教务长。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将中和位育这个概念，一方面落实在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把它落实在了大学教育的领域当中。我个人认为后者就是中和位育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应用。在这个工作当中他写了一系列的文本。对于我个人来说，甚至对于理解中国的大学来说，最著名的文本显然是1941年由当时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撰写要点，由他来撰写全文的《大学一解》。我想各位老师都很熟悉。

《大学一解》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它重新提出了在现代大学教育当中的目的。这个目的，他认为跟中国传统的教育实际上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但是也有差别。核心的差别是对于人的理解的不一样。他说：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

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

简单来说，他理解当时中国大学忽略了人，或者是把应该培养的人仅仅理解成为专家。但是这对于潘先生来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是中国传统通专之辩的一个新时代的体现。他对于通专之辩的讨论是从三十年代一直持续到 1950 年代。

他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是认为在大学里面应该是通专并重，在激烈的时候认为，通比专更加的强，就是更加强调通识教育。他这里讲的通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通，就是通识教育的通，这是非常明确的。为什么呢？他自己认为当时的教育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仅仅把人当成了专家来培养，而没有当成完整的人来培养。

1946 年他写了叫做《童子操刀》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童子”指的是小孩子，“操刀”的刀当然指的是危险的东西，“童子操刀”的一个基本的意思是：如果只强调专业或者是职业这方面的教育，而不强调对于完整的一个人的教育，其后果有如童子操刀，就是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手里所拿东西的危险性及其功能的小孩子，他拿刀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他在这篇文章以及相关的几篇文章里面，非常敏锐地观察并引用了当时在欧洲学界的一系列讨论，批评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当中对于人的忽略，而且他认为这种专业化研究和职业化研究，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学术，也并不是真正的教育。除此之外，他认为即便是他那个时候以国学或者以传统文化知名的学科也出现各种各样专业化的教育。

比如说，他以历史学为例来讲专业化教育，也认为是忽略了人。这样的教育跟传统意义上中国的教育是有根本不同的，这个根本不同是忽略了人，只是把传统意义上某些思想，或者历史上的知识当做了专业的知识来教授，而完全忽略了中国传统教育当中对于人的重视。他的目的以及他认为相应的大学教育所应该有的思想资源是应该以人本身为主，为根本。在教育上和学术资源上当然应该不分古今中西，以情和智作为讨论的重点或者思考的重点。这个是社会学的的一个基本讲法，教育的最终目的，第一是使得一个人成为人，第二使得一个人在他的社会生活当中，有与他位置相应的教育。这是他所强调大学教育应该有的目的和思考的资源。

所有这些讲法有一系列现实环境对他的刺激。比如说，在 1936 年他写了

一系列关于教育的忏悔，这个忏悔指的是当时的大学教育的忏悔，也是他所参与到其中的大学教育的忏悔。这个忏悔的核心就是从1900年之后逐渐在中国发展出来的新式教育，其中特别是大学教育，完全忽略了中国传统教育对于“士”的要求。他把这个士的要求重新拿出来，再对它加以总结：一个是在理智上，这个教育应该“推十合一”，指的就是“博约”；一个在情志上，一方面是在平时的要求，另外一方面是在所谓的国难当头，在危难时期的要求。

这样的要求和相应的士的教育，在当时他所认识的高等教育或者大学教育中，无论是公民的教育，平民的教育乃至于中小学的义务教育都没有实现。他说，在这个时代应该做一系列关于教育的忏悔。在这个忏悔底下，面对当时的“通”的教育和“专”的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种大概可以归纳为“泛滥无规”，另外一种大概可以归纳为“执一不化”，而这两种教育的问题跟士的教育所追求的忠恕一贯是可以对应起来的。换句话说，人的教育最终可以落实到在学术方面的教育，甚至可以反过来促进，或者说反过来学术方面的教育，甚至是职业和专业化教育的一个根本。

只有这样一个教育，才能培养出相应的士，才能使得青年人有着与他所身处其中的群体相对应的人格的培养。在他对于当时的教育的批评当中，士的教育缺乏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根本。而且这个根本当然不仅仅指科学教育，还包括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的现代公民在日常工作当中所面临的职责。所以与这样的批评相应，教育要“去蔽”，去什么蔽呢？在他看来，就是专业教育的蔽，专业教育貌似能够提供给现代人一定的确定性，无论是在安身立命，成家立业方面，还是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貌似能够提供给现代人的一个确定性。但是，在他看来，这是假的确定性，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无论是什么方面的教育，第一就是要去蔽。在这方面，他在1934年撰写《给留美同学的一封信》。在这封公开信里，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讲同学们到美国去留学，学习科学知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但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个。他没有明确说，但是，实际上他所说的应该就是社会学或者社会科学的观察，要观察美国这种新兴民族的蓬勃气象。换句话说，要去关注在知识以外的气象。无论是人在气象方面的培养还是关注一种知识之外的，就是使得这种知识得以可能的民族或者是文化的气象，在他看来，这个可能是教育和求学所真正要着力去做的。

潘先生不仅仅在理论层面上讲通识教育以及当时大学教育的问题。我觉得他讲的问题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类似。因为他曾经很长时间担任清华



的教务长，他和很多人讨论过教育改革一些具体的做法。这些做法大概有两个原则：一个是鼓励学生的主动性，第二是给予学生充分的自我探索和选择的空間。他有一些具体的尝试。其中一大部分针对当时的清华。他曾经跟像朱光潜这些教授们开过座谈会，专门来谈如何改革清华的本科教育。一个是扩展大学教育的年限，他认为应该扩展到五年。第二要减少课程和学分，以留出时间来两种用途：一个是学生自修。所谓自修，他特别强调一定要鼓励学生的主动性，要他们主动向老师提问；第二，一定要留出时间和空间让师生之间有课外的接触和联系。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的很多讨论，其实今天我们都在做，无论元培还是新雅都在做。

因为他在此前将近 20 年的写作里面不止一次强调过现代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制的消失，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人的引入，也就是现代大学中教授开始逐渐变成了以专业为职业的职业人，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

他认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和政治分不开，教育与文化分不开，教育与具体人作为楷模而分不开，所有这些东西在时至今日的大学教育里面都消失了。就算有，但是一般意义上不再以师徒制的形式出现。所以他认为现代的教育如果能够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一些做法的话，师徒制或者以楷模这种形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或者说，这是他从传统教育当中所能够汲取的更为重要具体的做法。在现实当中他跟费孝通的关系也如此。

他也认为应该加强人文教育，他认为这实际上是现代大学教育，真正的教育的唯一途径，而这种人文教育不是此前他说的专业化的教育，而是真正的人格教育或者说对于人的培养。他甚至认为，大学生应该在进入大学之前有一段时间独自探索。潘先生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慎独的一个具体实践。他说，有一两年时间脱离学校，也可以以两三个同学或者同志一起来进行。当然，这种具体的做法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讨论实际上都发生在 1948 年，他此后很快就失去了在清华的发言权。所以他鼓励这些改革的办法，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实现。

但是，他在 1950 年代的时候，曾经以回忆性的方式来写他的早期教育。我们都知道潘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出名是他在 20 岁的时候写的一篇关于冯小青的研究。他是在梁启超先生的课堂上所做的那篇关于冯小青的研究。那篇研究是他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成名作。无论是梁启超先生还是其他知名的学者都给他的工作，给他的冯小青研究以非常高的评价。到了 50 年

代，重新回忆起他在清华求学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认为他当时在清华所接受的这段教育实际上就是通识教育，恰恰是由于那段时间的教育，他才能写出像《冯小青》这样的作品来。

我们知道在社会学的历史当中，潘光旦和费孝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感人的。因为费孝通先生是潘先生的弟子，两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紧密，而且在潘先生最后的人生阶段，费孝通一直在帮助他，最后潘先生是在费孝通怀中去世的。这段故事和这段经历都非常的感人。后来费孝通在 80 年代重新回忆潘先生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认为是同样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潘先生的关于大学教育的讲法：他说潘先生这代人真正做到了儒家所说的推己及人。他也说，自己那一代和潘先生这一代的差别在于，潘先生这一代“关键是在怎么做人”。而这样的境界，费孝通说一直到他晚年。从己出发，以己推人，并且一以贯之。今天当然在学界有诸多关于推己及人的讨论。我觉得这个跟潘先生在他研究著述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对于大学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反思和理解以及他的实践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

**石井刚：**关于“童子操刀”的问题，这个“刀”指的也许可以说是整个现代科学或者是现代科学当中的某些层面，那么，潘光旦先生 1940 年代的当时所说的现代科学负面性或者危险性具体来讲是哪些？

**孙飞宇：**《童子操刀》这篇文章第一句话叫做“童子操刀，其伤实多。”就是说，童子操刀的伤害和问题是很多的。总体来说，他对科学的态度是这样的，倒不是说他反对科学，而是他认为科学就是一种人造的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人对于科学的态度以及对于科学工具的使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 1946 年，对于一战和二战期间各种新的技术在战争当中大规模使用的事实已经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尤其提到了爱因斯坦 1931 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个演讲。爱因斯坦在这个演讲当中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就是讲，科学可以节省时间，可以减轻生活的负担，但是人类还需要去学习对科学加以使用。他在谈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提到科学被负面使用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原子弹。他认为，原子弹在二战期间的使用是童子操刀的负面效果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原子能的发现和原子弹的使用，这是他对于童子操刀危害一个特别典型的说法。此外，他还有其他的说法，因为这个刀不仅仅指的是科学，或者说它首先指的是广义上的科学，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医学以及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

等。还包括类似公共权利的这些东西。这是他对于刀的理解。关于公共权利，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希特勒。

**甘阳：**补充一下：我觉得童子操刀今天最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并不在科学、自然科学或者科技。童子操刀最大的表现就在于 18 岁的小孩进了大学就读了商学院、法学院。这个是真正的童子操刀。坦白说，我真的认为心性都搞坏了。上来就是利己主义的，尔虞我诈的。我经常说，本科就读法学院，品德美德就不大可能。因为法学不讲美德，商学院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些方面我都觉得美国大学在本科教育的设计其实更高明。在本科阶段没有商学院、法学院这一类，包括没有新闻学这些东西。这个是我一直非常感慨的一点。18 岁到 22 岁的年轻人学一点知识就到社会上混职场。这就是童子操刀危害最大的表演。

**张政远：**孙老师谈到“去蔽”的概念，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与西方传统的真理概念（Aletheia）相符。它的意思就是“去蔽”，把蒙蔽的东西呈现出来。我们在大学这么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反而要把哲学所具有的非常卓越的地方呈现出来。换句话说，要把封闭的空间公开出来。我在报告中提到私学化以及再私学化的概念，而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日本二十年间出现了私学化的大潮流，也就是要把国立大学全部改革成为国立大学法人。虽然名字是国立大学，但全都成为机构法人。这种再私学化趋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注重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之下，要我们听从所谓国际化。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如果要强调去弊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谈一种开放，开放给所有人。所以这个书院不是给钱才拿到的东西，而是我们不用钱就可以无条件地给出来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书院，当然最好不要太大了，一个很小的书院也要开放给所有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想象。

**孙飞宇：**关于“去弊”这个概念，我读到潘先生这个说法的时候，其实有点惊讶。因为我专业研究的一个方向是现象学社会学，多年来一直在很认真地读海德格尔，所以我对这个概念的最早理解是来自于海德格尔的中文翻译。然后我读到潘先生在 40 年代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有点惊讶的。因为我一直以为这是熊伟先生或者是陈嘉映老师他们一路传下来的翻译。潘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既讲了“遮蔽”也讲了“去蔽”。我不知道潘先生跟熊伟先生是不是互相认识，互相有影响。但是两个人使用的概念倒确实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要讲

海德格尔的真理有关存在遮蔽和去蔽的讲法，我觉得结构上倒是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讨论学术和教育的目的。学术和教育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但是它的结果反而远离了人和生活。我觉得这个在结构上是有一点类似的，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对于真理的遮蔽问题。

**石井刚：**“去蔽”这两个字，其实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里面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也就是这个。他强调到达“理”的知性过程等于要依靠“去蔽”的功夫，由此来批评朱熹混淆“去私”的道德要求与“去蔽”的学术方法。他通过文献学的方式要求得真理，或者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求得“道”，而其方法论背后的真理观实际上还是与 Aletheia 的古希腊真理观遥相呼应的。

## 6. 张政远《唐君毅与新亚书院：私学与官学的三部曲》

**张政远：**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于 1963 年成立，但它还有前身，我们已经知道新亚书院最早是 1949 年成立的，然后 1953 年成立了新亚研究所。所以新亚书院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桂林街时期（1949-1956）、农圃道时期（1956-1973），还有第三个时期是我们现在的新亚书院在沙田中文大学（1973-）。

如果从机构来讲，第一个时期的机构就是新亚书院，然后 1953 年开设了新亚研究所。关于第三个机构，按我的理解，它跟本来的新亚书院不同，也跟新亚研究所不同，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1963 年成立，1973 年迁到沙田至今，但它不同于 1949 年之后成立的新亚书院。新亚书院基本上是很多国内的学者来香港开办的难民学校之一。老师是难民，可能很多学生也是难民。中文大学有几个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另外就是崇基学院。与新亚书院沿袭着中国的书院传统不同，崇基学院当时就是基督教的学校，它将英文的 college 翻译为学院。朱子学以来的传统，但是西方也有他们的 college，英国的 Trinity College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亚研究所是如何兴办的？新亚书院成立之后，他们想除了本科教育之外，应该也要做研究，研究就是要收研究生，研究生就要用研究所的名字。新亚后来得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做了一个研究的 program。当时只有硕士的 program。因为当时在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不承认这个 program，所以他们的学位要台湾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来认可。无论新亚书院还是新亚研究所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拿到官方的资助。

后来因为当时香港只有香港大学这所殖民政府办的官方大学，各界人士希望建立第二所大学，所以 50 年代后半叶做了很多工作，结果 1963 年才成立香港第二所大学，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既然也用英国殖民政府的钱，基本上从西学特点发展成为官学。官学的利弊我们要谈一下。香港多了一所大学，官方给钱，所以就是很漂亮的 campus，就是沙田马料水这个地方。我也在这里念书，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 campus。没有政府的钱就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有了好的环境才得以学习。

中文大学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学规定新亚书院这个 college 只是主理教学，没有研究。研究是由中文大学统一管理的 graduate school 来主理，新亚书院已经有自己的研究所，所以当初认为可以自己招收研究生，但没有得到校方同意，结果，研究所跟书院分开了。这一变动给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带来了不同的命运。新亚书院的命运就是越来越官学化，越来越受到大学统一的标准化的要求，所以唐君毅觉得越来越受气了，以为新亚跟崇基，联合就是大学最后的一个管理了，现在大学另立一个最高的管理的机构，根据牟宗三的说法，结果就是联合必立废，然后新亚也必吞没，这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新亚书院得到了大学的资源，但是失去了他们的自主，这是最大的问题。新亚研究所的命运怎样呢？1963 年中文大学成立的时候，研究所还在中文大学之内，但是后来因为中文大学不承认跟台湾有关的 graduate program，所以后来要脱离了。1977 年，新亚研究所就脱离中文大学，改为自己办学。所以它的命运就是脱离中大，脱离官学，这就是所谓的“再私学化”，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再私学化的现象。

这个官学、私学不是我自己的说法。唐君毅当时有思考教育哲学这个问题。他在一篇叫做《中国教育史上的私学与官学》的文章里面，试图定义什么是官学，什么是私学：

所谓官学，就是由政府机构提倡之学问，成由政府主办的学校中之学问；而所谓私学，即学者自己私人在社会传道讲学，私家开门授徒，私人设立学校所成之学问。所以这个「私」字并不是「自私」之「私」。官学主要是为满足从政府观点来所需之学，而私学则是为满足一般社会的需要、与学者个人在学术上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要求而有。

这里的定义咱们也非常清楚。这个“私”本来是一个个人，不是政府，也不是国家的机构办学的一些个人，这个私学本来是很多学问的本来开启的地方。但是私学一旦成为官学，“官府用它来考试，学术成为名禄之途”。所以出现刚刚说的再私学化。再看唐君毅怎么说的：

我以下只想就中国有私学兴起后，官学与私学之相对而互相转化的情形，大体略说。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凡新兴的有朝气的学术与教育，初皆是私学。此是第一点。但私学盛行到某一阶段、某种程度时，它便要成为官学。此是第二点。私学一旦成为官学，官府用它来考试，学术只成功名利禄之途，一门学问跟着便衰落，而其他私学再兴起。这是第三点。这三点可说是三部曲。

到底为什么开启的时候都是私学，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由一个人开启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唐君毅的文章里面谈先秦的孔子、墨子、孟子全都是私学的。佛教成为中国最早期的官学传统，以前的时候基本上不允许私学，只允许官学，后来也有儒家官学的现象，也有不同的私学跟官学的一个新式的交替。民初因为民间有很多杂志，做不同的私人的学问，影响很大。当时也有国立的大学出现，他们的人本来就是从民间私学里面找出来的。唐先生的结论很重要：私学发展成为官学，学问成为官学之后，很明显过于脆弱，所以新兴的私学的崛起，这个道理在哪里？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们要谈学术，一个机构越来越大的时候，接着政府管理等等出现异化、形式化、集权化，便失去了活力。说得更清楚的话，就是真正的学者和教育者，应该不去谈自己本来的研究，本来要谈的就是要学会对历史文化和过去未来负责。政府所办的教育，基本上是现代的大学，它谈很多学术教育的标准，谈很多 standard，必须要有教育和学术的理想性，但学术教育必须有人提倡才有活力，才有朝气。成为了官学之后，便会失去这些东西。

因为唐先生当时要面对的就是英国在香港的殖民政府。殖民政府到底怎么看私学与官学？本来在香港只有一所官学，就是香港大学，是1911年成立的。但是后来有中文大学兴起，本来应该是很好了，殖民地可以专注于培养本地的一些学人。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也谈到新亚书院成为官学之后。他们本来有很多理想，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共同的理想。所以他们的教育越来越不谈理想，成为唐君毅所谓的纯粹的纯官学，听从官方的说法。



例如，官方认为学生课程四年太长的话，就改三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刚刚改为三年制，后来他们发现全世界的潮流就是四年制，结果，大概 13 年前大学又改回四年制。大学要得到官方的钱，便要听从官方的说法。

唐老师的基本想法我差不多说完了，认为要办学院，办书院要关心的不是把它发展得很大，而是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私学的精神，这样教育才可以有活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新亚书院本来就是很小的私学，然后发展很大之后成为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然后再私学化成了很小的新亚研究所。我几年前跟石井刚老师去过新亚研究所，那里真的很小。我们很担心可能在大学垄断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新亚研究所的经营真的很困难。

也许还会有另外一个可能径路：新亚应该脱离中文大学成立一个新亚大学。本来应该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唐老师对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在另外一篇叫《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化教育问题》的文章里谈得很清楚：

看看新亚书院的教育，明有下列之变化：即教师们之分系分工，不相闻问的情形，更显著了；有通识教育的意义之共同课程，更被忽视了，一班学生人数更多了。此皆不必便是进步……我个人以为，学校教育之团体大，未必都是好，如中文大学之三个书院，合成一个更大的大学，把一切都统一起来，亦未必是好。这不是说我要新亚书院自己封闭起来，我只是从我感到大的大学中如师生，彼此互为不存在，不如在小的学校，师生彼此互为存在的好。同时我亦认为从前书院的教育制度，与英国之老的导师制度，亦确更有一“使师生互成为存在”的价值之故。

如果有一个新亚大学，一个很大的机构不一定很好，分系分工，会出现不相闻问的情况。这个机构太大的时候，没有可能出现传统书院里曾经存在的师生关系。所以唐老师也有讲到老师和学生“互为不存在”，也不如在很小的学校，“师生彼此互为存在”就好。我们要谈的不是一个很粗糙的书院的理念，而是书院的人。宋代的书院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现代的教育是以课程为中心。新亚书院的精神就是以个人的课程来完成任务为中心，是以人物为中心来传授个人的学问。

我最后介绍新亚书院钱穆先生作的新亚校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李猛：**看来新亚的情况相当有符号性的意义。当然它自己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新亚研究所的运行，我很想听听它放在中大和独立办学，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张政远：**用现在的课程来谈，大学有自己的通识教育，就是与原文对话，另外一个就是与自然对话。与原文对话，就是比方说，读柏拉图的 Symposium，与自然对话，就是念牛顿的 Principia 等等。基本上都是英文、中文文献。全校的学生念，新亚的学生也念。但是，现在新亚书院也有他们自己的通识教育，也有中国哲学的课，也有中国文化其他的课。所以很奇怪，我在中大新亚做学生的时候，有属于中大的课，也有属于书院的课。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书院越来越大，已经没有可能一起上课。现在大学全校大概有一万个学生，一个书院里大概有几千个学生。这样，很难谈到新亚精神，也很难谈跟老师有很好的关系。听我的学长们的说法就是，以前老师跟学生的关系真的很好。比如说，新年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要去老师家拜年，但现在没有了。其实在中大有其他比较新的书院强调所有的学生也一起，住在一起，我们说共吃共睡，这个很重要，疫情之中这些活动更见重要。

但 1949 年新亚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当年没有这个情况，我 1995 年念中文大学的时候，住进了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宿舍，名字是知行楼，结果当年很难做到知行合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书院的教育，本来书院除了教育之外还承担很多书院自己的活动。所以对于新亚研究所基本上不了解，几年前我跟石井老师第一次去新亚研究所，才认识他们近年的发展。但我想年青一代对新亚研究所的理解很少。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 7. 赵晓力《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吗？》

**赵晓力：**清华新雅书院跟北大元培学院比较类似，我们都是住宿式书院。所谓住宿式，就是不管学生选什么专业，他的大学四年都住在同一个楼里面，一个宿舍中可能住着四个不同专业的学生。元培的同学住在北大 35 楼，新雅书院同学住在清华 10 北楼。和其他学生宿舍楼不一样的是，元培和新雅的宿舍楼都有较大面积的公共活动空间。比如说，新雅有自己的图书馆，是在宿舍楼的地下一层。新雅宿舍楼从二楼开始住人的，一楼是公共大厅。我们想尽量给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相互交流、公共交往的空间。现在随着住宿式书院的流行，公共空间多起来了。



有了公共空间，就涉及到公共空间的维护，以及我马上要讲到劳动问题。我先从一件小事开始。去年的9月份开学不久，新雅书院有一个学生给我发来这样一张照片，显示他们一楼自习室的脏乱差。



我当时非常生气。大家都知道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课只能在网上进行，包括PPE一个暑期实习课程，叫做“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实习”，也没法去这些机关实习了，只能由书院自己安排，我负责代课。我想了半天，是不是可以由PPE学生乘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么一个想法，去给宿舍楼各个公共空间设计起草管理使用规范？这个工作学生做得非常好。但是，一开学，就发现没有任何改观。从这件小事上面，我开始更多地想一些问题。

比如说，公共空间的维护，有哪些是学生能做到的，哪些是不能做到的？我们会发现学生制定出一些规则（左图）很快，包括怎么进行预约什么的。但是，一到具体去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困难。比如说，地上有污渍（右图）需要清理。但清理需要专门的设备，而这个设备是在清洁工那里的，清洁工不一定放心给学生用。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更应该反思我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所受的劳动教育。

我今年50岁了，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开始上学，念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此后一直在大学里面工作。李猛和我同龄。以下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回忆，是不是也和你的记忆相符？我也特别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请教一下日本的大、中、小学是怎么做的。简单来说，我们上中小学的时候，校园和教室里的卫生都是由学生自己打扫的。甚至到每年3月份还会有文明礼貌月。我们会上街扫大街。这个在当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学雷锋。到了90年代我们进入大学，发现校园太大了，校园的卫生要由清洁工打扫。但是，宿舍楼内包括走廊、水房的卫生仍然是学生自己打扫的。我上大学的时候



候，在我所在的南京大学有定期的文明卫生评比，男生代表到女生宿舍楼检查，女生代表到男生宿舍楼检查，促使大家注重打扫。到1999年我开始在大学教书之后，渐渐发现，学生好像只负责自己宿舍内的卫生了。连擦教室黑板这个工作，我们那时候是由学生课代表去擦的，现在也开始由清洁工来做了，所以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节课下课了，第二节课再进入教室的时候，老师发现自己上节课在黑板上写的板书不见了，已经被清洁工给擦掉了。大学后勤逐步社会化和专业化了。

这个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去考虑由学生介入到学校里面的劳动（像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的话，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新雅书院因为疫情，我们从2019年开始的暑期“耕读”活动没法去江西农村进行了，只好在清华校园里头进行。学生跟着清洁工去学习操作割草机等等，但是很快会发现：如果学生大规模做这些事情，你其实是在抢清洁工的饭碗。再看右图，学生在拔草。学生认为校园有些地方的杂草从美学的角度讲是不应该拔掉的。但是从学校园林科的角度来说，这些草如果不是常绿的，它就属于杂草，“一岁一枯荣”的乡土草类，在冬季天干物燥的季节还有火灾的隐患。想在大学校园里面再恢复80年代、90年代的劳动教育已经不现实了，大学后勤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已经越来越来不容许有这样的空间了。

后勤专业化的背后，是所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201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给我女儿写了一首打油诗。其实写的是我在像她那么大



的时候，在我的小学、中学时代，对于劳动的这样一些理解：

劳动是指 挥臂 动手 出汗  
肌肉紧绷 注意力集中  
劳动还指 使用工具 直到  
工具像工友一样 亲密无间  
曾经 劳动还指向集体劳动  
号子 歌声 力气汇聚到同一个点  
又传导回来，你的力气  
和我的力气 彼此不分  
后来 劳动者中混进了你我这样的人  
坐着不动 怎么是劳动呢  
挣钱 怎么是劳动呢  
厨房 才是劳动者的领地……

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清楚，劳动就是指体力劳动。但现在，在我们自己家里，其实也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了。因为现在你会请小时工做饭、做家务，会用到到各种各样的市场化的劳动力，给自己节省时间。

我们当年所受到的“德智体美劳”教育，其中指向的是一个道德品质叫做勤劳。前面李猛曾提到一张清华学生的作息时间表，我们可以看到它从早到晚排得密密麻麻的。下边是最近清华很有名的一幅图片，就是学生在晚上下课回宿舍的路上，骑着自行车，但同时他的电脑还在跑程序。这个在清华，在网络上，都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我们看到，现在的学生，似乎在勤劳这个方面并不欠缺。我有时在想，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年轻白领会接受 996 的工作时间呢？所谓 996 是指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然后一周六天这样一个工作方式。这个是我们这代人不可能接受的，他们现在都接受了。为什么他们能接受？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开始过 996 的生活了。从小学开始已经是 996 了。从脑力劳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都已经相当勤劳了。



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前面提到的新雅书院的暑期“耕读”活动。从 2019 年夏开始，由甘阳老师推动，我们组织学生暑期到江西婺源“耕读”。一年级的学生都去，分两批。一周时间在工厂里面劳动，一周时间在农村里面劳动，就是一周学工，一周学农，晚上由李震老师带着学生读书，读《论语》。待会儿请李老师再补充一下。从学生回来后写的《新雅耕读笔记》里面，我发现这个好像是现在大学里头进行劳动教育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它带有游戏

的成分，其实指向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在现代大学里面其实已经非常罕见了。

我非常喜欢学生从婺源带回来的这张他们在田间地头休息时拍的照片，立刻让我想到了《诗经》里头的八个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多么舒畅，多么自由，这也是朱熹会引到的八个字。江西婺源也是一个跟朱子有渊源的地方。不一定是“勤劳”的德性培养，而可能是“自由”的心性涵养，才是下一步“劳动教育”该走的一个方向。一屋不扫，固然不能扫天下，但没有这份舒畅，这份自由，即使把天下都扫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李震：**我是来自清华新雅书院的李震，赵晓力老师和甘阳老师谈到了新雅的耕读活动。我稍微补充一点信息吧。新雅书院从2019年开始在全院范围内推行劳动的实践。这个劳动的实践由两个部分来组成：一部分是身体的劳动，真的是物理的劳动；另外一部分也伴随着读书的活动。2019年我们在江西婺源，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放在了学校校园中。这两年我都跟着同学们一起参与他们读书的活动。这个读书学习很简单，我们选了《论语》作为阅读的文本。选《论语》的原因一个是因为第一年去的婺源这个跟朱子有渊源的地方，另外，我们也认为《论语》是跟他们身心最切近的文本。我们的目的很简单：这个阅读第一不是为了研究，第二不是为了考试，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字：就是为了“养”。就是像刚才甘老师说的，希望这些未来社会当中重要的参与者能够多一些人文的价值或者美德上的滋养。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一门课程能够培养，也不是

短短的 10 天、14 天就能够完成，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前两年的情况来看，效果还是比较理想。同学们一旦被放在一个既没有考核的压力，同时也没有太多享乐的活动空间里，反而能专心读一些书。我每天都参与同学们的讨论，发现他们的讨论确实能触及一些身心修养上非常根本的问题，有自己个性化的体会。这就是这两年我们做的比较有意思的尝试，也希望各位老师多多给我们反馈，帮助我们不断地改进。

**甘阳：**我们现在要做劳动教育，实际上也非常困难。我做劳动教育，并不是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开始，我是在 2009 年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第一年第一届就开始了。也就是 2009 年暑假，我当时要决定他们下乡劳动，学生非常诧异。我是完全用自己的霸权性格强制要求的，所以学生们都会很诧异。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这个劳动教育整整一个月，但是清华大学只有两周。因为清华大学的功课实在太重了。他们连暑假都是没有空的。我要求他们两周进行什么事情也不做的劳动。对于学生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最满意的是在婺源的村子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他们连手机都不能用。所以效果非常好。他们整整一个星期不用手机。只要不用手机，其他做什么都好。这样，人就活过来了。我觉得这个经验是我特别想推广的。想一个办法，无论你用强制还是什么办法，大家没有手机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人际关系大为密切。他们如果不下乡，四年都不能实现多谈心这样一种经验。然后再读《论语》才会有感觉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很难，而且随着国际化，所有的东西都会导致分心，很难让学生把他们的心思用在自己身上，让学生想追问他自己都比较大难。

## 圆桌讨论

**甘阳：**四个报告都非常好，非常有意思，而且这四个报告都把我们带到东亚的传统上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一个教育并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一个很感性的。大家都是在强调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仅仅讲书面式的学术共同体的话，并不足以反映我们的努力。新雅书院一直强调的是感情的共同体、友爱的共同体。这是人与人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感慨，四位老师的报告让我很感动。比如说，潘光旦先生这些老前辈想的问题。潘先生在 1948 年到 1950 年代提出大学延长学制到 5 年。我们现在新雅有一种成功的表现在于我们很多同学自己读了一年以后主



动提来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五年制？”因为专业知识需要的时间非常长，就不大可能有充分的时间投入到通识教育。所以我现在私下鼓励学生，说：可以选择五年毕业，这是你自己选择，自由精神的自由决定的权利，你们是自己可以把握的。

但是这里可以看到从老前辈到我们这一代的很多问题。到了我们这一代，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所以张政远教授报告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我是很有感受的。我自己曾经在香港大学工作了十年，而且这个十年当中，我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我那时候愿意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而不愿意给香港大学的学生上课。我从2000年开始一直给中文大学的学生上课上到2007年。一上课，你就能够感觉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还是很明显地受到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他们的新亚传统。我在历史系做客座，上课的学生里也有理科的同学。让他们写文章，大多数学生都会引到牟宗三先生和唐先生的话。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学生也不是哲学系的。也就是新亚书院的传统还留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可能是香港的大学里面通识教育做得最早，而且他们是有一个核心的。那就是，牟、唐、钱三位先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氛围还能感觉到，但是越往下就越没有了。我后来感觉香港中文大学一年比一年差。原因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学的官方语言当然是中文，但回归以后，官方语言反而改成英文。所以当时很多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都写信抗议，但是都没有用。我感慨环境，大环境实际上越来越差，越来越糟糕，香港中文大学后来虽然也在做通识教育，但是我觉得远不如原先更能够有效果。还有它的语言也很重要，名字叫中文大学，语言变成英文，就是非常名不副实，而且破坏自己大学的传统。

**张政远：**我已经离开中文大学了，我也没有为中文大学辩护，但是我对中文大学，对于新亚有一种爱，所以这种批评我觉得很好，因为你它对它有感情，才会感受。到底为什么出现问题？问题在哪里？我今天谈到香港殖民时代，我觉得学术界也有学术殖民主义。学术殖民主义不是外在的，而我们做学问的时候，自己有一种殖民主义的心理。怎么对抗学术殖民主义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这么多年也做了一些事情，只有参与学术殖民主义，才能进入学术殖民主义这个帝国里面。我没有答案，但我的愿望就是对抗学术殖民主义，对抗全球化，对抗英文中心的一些学问，我是真的很希望做一些事情。

**孙飞宇：**我也想补充性地提一些想法。田中老师和李震老师的讨论有所启发。

我以为朱熹一定要诉诸书院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学术，其目的之一，我猜想大概也跟仪式空间的建立是有关系的。我们分享一个空间，实际上是在分享一个仪式空间。我们身体化的时间本身带有一种礼仪性质。或者说，我们分享一个空间给你套一个实践的形式。刚才张政远老师的报告里面说，官学和私学利弊问题，就提到官学化走向形式主义化。这个形式主义化其实我们总是面临的。比如说赵晓力老师所介绍的劳动。过去中国义务劳动就是学雷锋之类的。日本其实也有。日本中小学的孩子都要自己打扫自己的教室，但是全部都是形式主义化，所以不可能当真。但是恰恰是这个形式让我们有一种归属感，做共同体一员的感觉。我们如果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话，可能没办法处在一个空间来一起生活。所以这个形式主义和诉诸形式，换句话说，就是要建立我们的礼仪的部分。当然，这里面是会有争议的。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们现在要推行新的书院模式、新的学问的共同体这么一个空间，大概需要某一种的礼仪空间的重新建设。

**甘阳：**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三所大学，清华也好，北大也好，还有你们东大也好，都太精英了。太精英的大学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刚才田中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不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清华和北大的学生现在是最不自信。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建立这样的精英大学，但可能要把自己放下来。也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精英大学里面做书院，仍然很难摆脱以知识为中心，纯学术为中心。要走向尊德性和道问学的重新统一，我们的难度可能更大。我最近经常感慨，有些规模较小的大学，科学方面的任务没有那么重，它们可能做得更好一点。比如说，青岛大学如果按照现在的排名标准应该比较靠后，它既不是985也不是211。但是，他们办的浮山书院非常有成效。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品性方面做得很好。毫无疑问，他们的学生以后成为学术尖子的可能性也许不像北大、清华、东大这样高，但是，他们在培养学生的为人，而且在非常感性地接近中国古典诗词以及古代哲学。他们在培养人格方面，其实很成功。我看得出来他们的学生是有一种为人的气质，很有礼貌，有一点君子之风，而不像我们现在这种精英大学的学生，是往往一开始就把自己抬的很高。至于一些民间的书院，可能和大家没有多少关系，但他们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我们也可以考虑把这样的书院纳入到我们思考的对象。他们更植根于东亚的书院传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李猛：**今天我们确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各自在自己学校做书院的尝试，还有一个知识生产或者和所谓世界哲学的对话。上次在东京听纳富信留老师讲世界哲学的基本纲领，我做了评议。我现在很矛盾，就是说，对于亚洲的国家来说，必须借助这样的世界哲学来打破一个哲学完全被西方话语垄断的局面。但是，全球化也有一个危险。我们为什么要做书院？我觉得研究型大学的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有共同点。它就是脱离人们和生活，脱离自己自然的和血脉的联系，是去根化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书院体制就是要强调人的生活要扎根，要真正扎到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要从自己生活经验中重新提取哲学的动力。现在我们太多的学术交流其实是为了交流迫使人们必须把自己的生存经验都消除掉，这样才能交流。因为大家怕别人不懂属于自己的生存经验，结果，越是世界哲学，其实越脱离我们人生这种世界性的体验。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书院的努力要通过东亚独特的生存经验，重新从里面提出新的哲学动力来，而不是简单地出于国际化的目的进行交流。我们首先要有交流的东西，真正东亚的经验，应该重新要把它结晶成我们的具体生活经验。这也不一定是完全传统的。我觉得许多同学许多时候读柏拉图、卡夫卡的时候也许感受会更直接。那么，怎么把东亚的经验和他们现代性独特的体系结合起来，产生新的世界性的理解和生存的东西，来推动我们的哲学前进？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和世界哲学对话，要贡献新的生存经验，来使哲学往前推动。我们怎么把根基于东亚历史传统和现代性的独特感受和经验升华成一种哲学的思考？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未来书院交流和思考的一个努力方向。我非常期待将来和各位朋友们一起在这方面继续推进我们的工作。

**石井刚：**关于世界哲学的问题，我非常赞同李猛老师的说法。按我的理解，李猛老师所说的“矛盾”其实就是纳富和中岛他们提倡世界哲学的出发点。我们要重新了解“世界”两个字。这个世界如果只是全世界，或者 global 这个意思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应该从生活的、最身体化的部分出发，重新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田中有纪：**今天我了解到北大和清华的书院在什么样的理念下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他们的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理念，特别是宋代书院的理念。这个很重要。但是我比较担心，如果过分认真地理解朱熹思想，会带来过分勤劳的态度，就是 996 的态度。有一个老师曾经告诉我，研究朱子学的学生都比较认

真，非常努力学习。选择道教、佛教或者阳明学的学生不太认真，不太努力学习，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非常自由。所以我认为过分认真学习朱子学也是有毛病的。

**孙飞宇：**我们最近一两年尤其过去一年在清华和北大非常火爆的一个现象是同学们讲的“内卷化”。内卷化这一社会学概念突然变成了一个大众的名词，成为了所有人都在互相说，所有人都说自己没有时间，疲倦、劳累、厌烦，极其辛苦，但是又没有什么成效。我觉得这个现象在过去一年前期间突然成了我们在元培学院所面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同样也是清华很多同学反映的一个问题。我希望以后在各个方面多去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进了大学以后的问题，它确实确实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学生的内卷化显然不仅仅是我们大学教育所带来的。因为大学教育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一个反映。我想从这些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会对我们也有启发。因为我们在跟很多同学座谈的时候，就是谈话，因为我们花很多很多时间跟同学聊天。同学们往往跟老师聊了之后说，今天下午我心情舒畅。但是到了第二天又不行了。因为他们还要面对现实生活当中遭遇的制度性问题和同辈的压力。或者有些同学会告诉我说，接受了老师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像自我欺骗？等等。这些反映我觉得还是要认真面对。不是说我们在教育上不努力了，而是我们在教育上还要努力。现在元培学院大一、大二的同学已经比此前几届的元培的同学状态要好很多，确实如此。你在学生身上花了时间，学生确实有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是否再打开一下讨论我们在教育上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我们造成的问题。

**甘阳：**我觉得今天的讨论非常好。东大和北大元培的合作时间已经比较长，我们新雅第一次跟日本方面交流，我希望以后在北京或者东京都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另外我想，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学生之间的交流，比方说，东大的学生和清华、北大的学生互相交流，听听他们学生的想法。孙飞宇老师刚才提到的“内卷化”这个词大概也是清华的学生搞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学的比较好的学习生态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1980年代读书也好，1990年代读书也好，感觉现在变化很大。可能归根到底还是看看学生到底怎么想，我们在想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学生的论坛，主要是他们来讲我们来听，这样一些可能性。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期望。

总之，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线下一块儿聊聊天。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术和大学的一种异化状态。也就是说，越来越正式，越来越形式主义，它很难回到一个生命状态。有的时候，非正式的交流效果更加好。所以保持这种 workshop 的方式，也就是把 formal 和 informal 结合起来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的。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石井刚、郭驰洋)

## EAA 座谈会“书院内外的学问与艺术生活” 发言录

发言人：

甘阳、赵晓力、李睦、刘晨（清华大学）

李猛、孙飞宇、李泊桥、刘建波（北京大学）

张锦少（香港中文大学）

石井刚、张政远、柳干康、田中有纪、高山花子（东京大学）

主持人：铃木将久（东京大学）

---

**铃木将久：**这是我们第二次以“书院”为主题的会议。这次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这三所书院和学院的代表。

**石井刚：**今天的主题是“书院内外的生活和艺术”。我们东亚艺文书院取名于《汉书·艺文志》的“艺文”二字。这个“艺”字比今天我们通常说的“艺术”包含更大的意义。我想把这个古义的“艺”字作为学问组成的一部分来重新诠释。那么，它很有可能和我们现在推行，将来要发展的书院教育与学问模式息息相关。我们的书院里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去年第一届的讨论当中，新雅书院赵晓力老师介绍新雅书院开展的劳动的例子。他们不只是在校内劳动，也会到野外去参加劳动。昨天甘阳老师在微信上发过来新雅农场的例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尝试。再比如，北大元培学院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体育活动与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这些我们都可以纳入到重新思考并激活“艺”字时的重要资源。希望各位老师分享各自的经验，让我们共同想象当代书院更美好的发展远景。

### 第一场 艺术教育进入书院：以新雅书院为例

**甘阳：**在新雅书院我们虽然已经有很多艺术方面的课，但是我们暂时并不打算



强行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修一门艺术方面的课，主要考虑的是现在的学生好像常常是为了一点学分而学习。我希望在艺术方面尽可能不为了一点学分学习，这样会比较好。除了李睦老师和刘晨老师的课以外，新雅还有另外一个配套课，是中国画方面。像这学期我们有中国山水画，下学期或者上学期都有花鸟画。向这样的课我们没有学分，学生完全自由，愿意来就来。主要的想法还是希望在艺术课方面，学生能够没有带任何功利心来学习。这样效果更好，包括下学期我们还有钢琴、舞蹈的课。我们大家都希望是这样。另外一点就是现在的学生从中小学开始好像都学习有用的知识。我们比较希望透过艺术带给他们一种熏陶性的、领悟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知识。这是我们艺术课特别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 1. 李睦《从美院到书院的教学》

**李睦：**我作为清华美院的教师到新雅书院来做教学，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当然在新雅书院开设的课程肯定是艺术课程，但是它不同于我们美术学院的专业课程。我大概分析一下几个小点，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思路。

第一个就是书院里面的绘画。因为我自己是美术学背景的教师，所以我对艺术的切入点当然是从绘画、美术开始的。所以在书院里面同学们通过这个课来接触绘画、认识绘画。当然我更希望他们能从中认识艺术，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怎么理解和看待艺术的。通过自己对艺术的认识最终能够更丰富、更灵活地认识自己的生活和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所以我把上面谈到的这些思考通称为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因为美术学院，作为专业学科的学生他们考虑艺术是从职业化的角度考虑的，很难避免功利心态。我们新雅书院的同学们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学科，他们往往会从自己的学科背景或者教育背景出发去思考他们面对的相同艺术作品与观点。他们会做出属于自己各自不同的艺术思考，所以他们会在绘画实践练习当中去画出很多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作品。我们把它称之为另外一种思维。就是他们要去考虑和他们的生活并行的现实世界之外，不是有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是和我们现实生活世界平行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要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这样的艺术世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而不是由我作为教师或者由某一种观点提供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世界，他要通过这样的思维去构建，通过他的绘画、思考逐渐把他对于生活的理解一点点地剥离出来，所以在课堂上我比较强调让他们去注意与捕捉这样的思维。另外

也是通过这样的思考帮助同学们逐渐学会思考与认识美。不一定要达到某种目的或者标准，更重要的是尝试去触及美。当然也包括指出美之所在，我们现有的清华艺术博物馆的效果还是蛮好的。每年每学期都有重要的展览，现在大家看到的展览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部分，我会把同学们带到博物馆里面去跟大家一起分析作品。



第二个我想说的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披着教授外衣的艺术家。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庞大的艺术学院，在中国的各个大学好像都会有美术学院或者学科，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专业教师学者，我们共同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学科或者学院在综合性大学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国家投入了非常多的钱为的就是培养少数的职业艺术家吗？在学院中的教授、学者都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你是在从事职业教育还是从事针对所有在校学生的艺术教育？我把这个艺术教育称之为通识性的艺术教育。他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分与认同感上的矛盾，就是他们到底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或者学者？因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是两件事情，但是现在在综合性大学的教育过程当中，大家分不清这两者的差异。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美术学院的教授或者音乐学院的教授到底应该教什么？一个学校里面有庞大的艺术教育机构，但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以后，艺术教育和通识性艺术教育仍然是油和水的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所以这个也是我这10年当中考虑的问题。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教授，我怎么处理好职业和艺术教育这两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要说我在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科方面的思考，想跟今天的老师们共同分享一下。我经常被大学教务处的老师问到：我的课程究竟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我有的时候就回答不上来，到现在我好像也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共 32 个学时 16 次课里面有一半是理论课一半是实践课。我觉得这两者都很重要。我被问及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做出选择和回答，甚至会涉及到我的劳动报酬，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所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情形，就是有可能这是一门既不是艺术学也不是美术学的课程。那这样一个和艺术和美术都有关联又分别不属于这两个领域的课程，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学科呢？因为这不是艺术课程本身的问题，可能我想古典学、史学、哲学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把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是不是也是我们从事通识教育的学者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清华美术学院的教室里面，新雅书院教室里面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实践环境，给同学们创造空间与绘画材料上的条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同时容纳很多同学一起从事绘画创作，同学们有很多实践方面的体验，用来验证他们自己在理论上对于艺术的思考。



第四个就是感性和理性的问题：感性和理性的关系在绘画中是如何体现的？我跟同学们探讨这些问题。我要提出来的原因就是大多数同学做不到。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学生面临的问题。我跟他们提出两点思路，第一个就是不加思索地呈现绘画在先，先把绘画画出来。乱抹也好，涂鸦也好，先把东西画出来，然

后再认真仔细去分析自己画的画面。一张分析不出来，两张三张十张一百张。我在课上要求他们的作业量是很大的。这样可以纵向地去看每一个人在绘画当中呈现出来的视觉规律：他为什么要这样用色，为什么要这样用线条。但是我们多数同学的思维经常是先给自己确定一个主题，然后用绘画的方式去完成那个主题，就把绘画降低为看图识字的层次之后，开始怀疑自己画不出来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怀疑自己的艺术能力、技巧，以至于最后放弃绘画，放弃对艺术的理解。这是我提出来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这是在绘画课程中，同学们画完以后要互相观摩，互相横向对比然后与自我纵向对比之后在里面寻找规律。



第五个就是我在教学当中会尽可能排除同学们对于艺术的误解。他们认为艺术仅仅只是艺术专业的学生或老师们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太多的关联。所以我们在新雅书院开设了 11 年的艺术课程已经慢慢在化解同学们对这件事情的误解，他们不再认为艺术只属于艺术家，更多人认为艺术是自己生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认为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在人生当中可能会非常不完善。所以上过课的同学就不会再说自己不懂艺术、没有艺术细胞或者自己跟艺术无缘等等的话。所以他们可能会从他们自己专业的学科出发，从哲学、法学、自然科学出发去探讨并思考艺术。然后他们探讨的观点与实践过程往往比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更有特色。所以这也是我非常珍惜自己这些年在通识艺术教育里面做的事情的原因。



最后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艺术课也是对艺术的追求，就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艺术教师的追求。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试着回答我前面提出的问题：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遇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时候应该何去何从？我觉得自己是在把艺术课当作自己的艺术创作来对待，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自己的行为艺术是吧？我会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我不会因为长时间从事教学，没有时间画画实践、没有时间参加国际展览而觉得自己失去了太多，我反而会觉得我在教学当中得到了很多。希望更多的教师，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教师不能只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为全体学生提供帮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职业教育的局限，在对于通识教育中从事艺术教学的教师们的基本要求。

## 2. 刘晨《现代文艺复兴人》

**刘晨：**大家看到的这幅画是拉斐尔在梵蒂冈画的壁画。大家看到的是太阳神阿波罗和他的缪斯以及古代合现代的诗人在帕纳索斯山上。



Raphael, *Parnassus* (1511), Vatican City

这幅画跟我们都熟悉的雅典学院那幅画是在同一个房间里。如果说雅典学院那幅画的主题是哲学，这幅画的主题是诗歌和音乐。在我的心目中，书院教育其实就应该向帕纳索斯山一样。我今天说的事情既在书院之外也在书院之内。我在新雅书院教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但我与李睦老师不同的点在于，首先我接受的训练不是美院体系的。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系攻读艺术史的哲学博士，是在人文体系框架之下。所以我在开课的时候也不单单进行美育，而是把它放到一个人文的框架之内。我希望以作品为出发点带领学生们对于历史和人类文明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原先是学建筑的，也做过建筑师。所以我想今天先从这里开始谈吧，因为大家可能对建筑不是特别的熟悉。屏幕上看到一句话：“我骨子里是个音乐家（I am a musician by heart）。”

“I am a musician by heart.”

— Le Corbusier, *Modulor*

说这句话的人是现代主义大舞台上的一个风云人物——法籍瑞士建筑师 Le Corbusier。整个 20 世纪建筑领域人才济济，但是没有谁像他那样对现代



世界的型态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他躲进自己设计的瑜伽小屋去畅想城市生活方式。他一边抨击旧传统，一边创造新传统。立志让现代人都住进他发明的高层公寓。但小时候他更想当一名画家，是绘画老师让他去学建筑的。然而他却咬牙切齿地说：我对建筑和建筑师深恶痛绝。若干年后当他成了自己深恶痛绝的那类人，他又开始替建筑说话。他把建筑的问题归结到度和比例，写成了一本赫赫有名的《魔法法则》(The Modulor)做为总结。他在书的末尾大发感慨，说出了这句话：“我骨子里是个音乐家”。但他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又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吐露的心声，他说：我骨子里是个数学家。我觉得这是一种敏锐的直觉。建筑师不但要有学问，不但要懂艺术，还要过一种充实的心灵生活。我想 Le Corbusier 的事迹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充分说明 Leonardo da Vinci、Leon Battista Alberti 那样的文艺复兴人还没有完全绝种。在为现代建筑寻找普世法则这件事情上，Le Corbusier 的确是向文艺复兴的先辈们看齐的。

而文艺复兴人则要像古希腊罗马的贤者们看齐。毕达哥拉斯就不用说了，他是用数学和实验方法研究音乐的先驱。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过一个著名的洞穴预言，说苏格拉底认为我们最初都是洞穴里的囚徒，如果不想当囚徒就得受教育。什么是恰当的教育呢？苏格拉底的标准是能让心灵从朦胧的黎明转到真正的大白天，上升到真正的智慧。他列举了四种学问：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到了中世纪这四种学问就是大学里的四艺，学四艺之前还要先修三艺，语法、逻辑、修辞。



大家注意这个屏幕上我放的这两个拉丁文——quadrivium and trivium。这个拉丁文的本意是四条道路交会处，或者三条道路交会处。三艺和四艺合并

成了著名的七艺。那么，七艺交汇在何处呢？就是这个七瓣花的核心——哲学。他们有七艺，我们东方有六艺。七艺和六艺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交集，比如说数学和音乐。然而无论七艺和六艺都没有建筑。仿佛这门古老的技艺和学问还不够高级。所以建筑师们就很不服气。

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家和工程师维特鲁威，留下了一部著名的建筑师书。他在开篇第一卷就谈到了建筑的教育。他说建筑师应掌握多门学问，建立全面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因为所有其他术业的工作都要靠它来检验和判断。这个知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科目：绘图、几何、光学、算术、历史、哲学、音乐、语文、星象、水文、地质。别说三艺四艺六艺七艺，凡是两千年以前已经有的学问和技艺，建筑师都得学，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还要能掐会算，听起来非常可疑。所以维特鲁威就解释说，对于缺乏经验的人而言，掌握这么多学问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切学问都有共同根基而且彼此关联，了解这一点就可以触类旁通。也就是说，两千年以前工程师维特鲁威提到了建筑师要有通识教育。维特鲁威特别强调哲学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哲学就是爱智慧。他说爱智慧的建筑师应该志向高洁，谦逊而不狂妄，诚实和不贪婪。这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正直诚实的品行，将无法胜任任何工作。所以这句话给我感触也特别深，如果给维特鲁威给罗马人办一所建筑学院，我想他应该很像我们古代的书院，不光传授学问，还注重德行的培养。

然而两千年以后的今天建筑系的学生已经不可能，似乎也觉得没有必要接受这类通识教育。但是祖师爷的话偶尔还会在耳边回响。说到这，我想起了一件事。30年前我们建筑学院的院长在年终总结会上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收进来的学生是高考状元，送出去的就不是了呢？看来院长很为目前的建筑教育担忧。这个问题抛出来却没有人能回答。我也很想问，但是我把问题改了一下，我说为什么我们领进来的是文艺复兴人，送出去的就不是了呢？我关心的不是高考状元，而是这些学生们的身心成长。他们刚迈进大学校园的时候，是最像文艺复兴人的，多才多艺，知识结构还在一个比较全面和平衡的状态。如果按照维特鲁威的标准，可以说是准建筑师了。然而过两年就会发现他们的眼界在逐渐变窄。到了高年级，就很少有经历和愿望去关注建筑之外的事情。以前学过的其他的知识和技艺也生疏了。这就好像一个人从小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但是武功废了。我想任何专业的大学生多少都会经历类似的变化，但是这个现象出现在建筑系就挺奇怪。因为我们总有一种优越感，觉得建筑很特殊，又是艺术又是科学。我们的学生不需要去修通识课，我们就是通识。可是

看现在建筑系的课程设置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一切跟建筑没有直接关联的知识都取消了。数学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建筑数学，连美术类课程也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课时，而建筑系的学生们还在不停地熬夜画图，没有时间做学问，没有时间真正读书，艺术生活也成了奢侈。

大家都知道清华建筑系是梁思成创办的。去年正好是梁思成诞辰 120 周年，学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按照主流观点，清华大学建筑系是综合了德国包豪斯和法国巴黎美术学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创办的，但是很少有人再往前追溯。其实，无论是包豪斯还是巴黎美院，源头都可以回到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建筑学院，甚至没有建筑师行会，但是有文艺复兴人。设计房子的是艺术家、学者和他们的供养人。我本人是学建筑出身的，又钻研了多年的文艺复兴。我不只一次想，梁思成身上就有浓厚的文艺复兴气质。他兼有现代学者和中国传统士人的特征。我想他跟 Le Corbusier 一样，也是一个现代文艺复兴人。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梁思成当初创办建筑系的时候是不是也怀着维特鲁威和 Alberti 的理想，把多种学问和技艺融会贯通，兼顾中西传统来创造一个能够容纳现代通识教育，滋养年轻人身心的建筑书院？梁思成已经作古，我没法向他求证，但是我查阅过当年的档案和当年建筑系的课程，发现远比我们现在的丰富和完善。

前面多次说到了文艺复兴人，但到底什么是文艺复兴人？大多数人对于 Renaissance man 的印象就是像文艺复兴艺术家那样的全才或者通才，但这只是一种浅层认知。全才并不特别稀罕，无论哪个时代都能找出一些。但并非任何一个全才都担得起文艺复兴人的称号。即便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随便一个艺术家或学者都能叫文艺复兴人，我来举两个当之无愧的榜样：一个是大家都熟悉的 Leonardo da Vinci，还有一个是 Alberti。学过建筑历史的人都听过 Alberti 这个名字。他继承和发扬了维特鲁威的思想，写了一部《论建筑》。从他开始，建筑师成了有身分的人物，而不再是中世纪的工匠，成为能够跟艺术家和学者平起平坐的一类精英式的人物。Alberti 的涉猎远不止建筑，他是一位作家、艺术家、建筑师、诗人、哲学家、语言学家、也是密码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人若有志，则无所不能（A man can do all things if he will）。”他认为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人应当拥抱所有学问。发挥全部潜能，换成我们的话，就是人尽其才。

这是他给自己做的一个小浮雕。上课时我会特别引导学生去发现这个浮雕上很特别的一个细节，就是黄色的圈里，你们仔细看是一只眼睛，是一只长了

“A man can do all things if he will.”



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  
Author, artist, architect,  
Poet, priest, linguist,  
Philosopher, cryptographer

*De pictura* (On painting)

*De re aedificatoria*  
(On the art of building)

*De statua* (On sculpture)

*Della tranquillità dell'animo*

*I libri della famiglia*

翅膀的眼睛。眼睛是用来观察的，翅膀是用来飞翔的，所以这就是插上了翅膀的想象力。这是 Alberti 对于人的理解。人尽其才，这也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个基本信念，Alberti 是用一生去践行这种信念的。

Alberti 让我再次想起苏格拉底、维特鲁威和中世纪大学的七艺。我发现把这个传统串联起来的是一条关键线索：哲学即爱智慧。人的确可以拥抱许多学问，但最终要回到心灵的修炼。如果仔细阅读 Leonardo 和 Alberti 的传记就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多才多艺是由内而外修炼而成的。他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始终保持新鲜和好奇。他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文艺复兴人的根本，其实是一种鲜活的、旺盛的、可持续的人生态度。我们再从词源上看，Renaissance man 又叫 Universal man。Homo universalis 这个拉丁文来自希腊文形容词 polymathes，意思是博学。由此衍生出了名词 polymath 指的是博闻强记多才多艺，并且能够把多种学问和技艺融会贯通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人。这跟维特鲁威的理念也是非常契合的，而 universal、polymath 这两个词又跟高等教育的起源密切相关。University 就是大学，polytechnic 原来是工艺专科学校。所以要做一个现代文艺复兴人，就得接受高等教育。可是，反过来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能造就一个文艺复兴人？我想是书院。

我在新雅书院教了五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我始终能够感受到一股旺盛的活力，特别让我感动的一次经历是两年前在新雅学生入学典礼上的发言。我往报告厅的方向走，老远就听见叮叮咚咚的音乐，进去一看几个学生正在排练开场的热身曲，架子鼓、小提琴、钢琴。他们玩得很开心。我的精神也为一振。那种感觉就像吃了新鲜草莓，我好像看见一群活生生的文艺复兴人。他们将在这里拥抱学问，享受艺术生活。让心灵从朦胧的黎明转到真正的大白

天。这非常契合我讲授和分享文艺复兴艺术的方式。我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学生们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我会特别鼓励和引导他们用自己的双眼和心灵来观察和认知文艺复兴艺术。我希望他们能理解文艺复兴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时代。文艺复兴人就在我们中间。当然也有不足。我觉得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身体的修炼，在书院这样的地方，身体跟心灵应该共同成长，要知道 Leonardo da Vinci 不光是一个博学的艺术家，他还拥有运动员的体魄，他的身体素质是很棒的。然而我带大一的学生参观校园，跟他们讲这个建筑怎么怎么好，这时候大家还跟得上，但是我再往前走，我一边走一边兴冲冲地讲，忽然发现没人了。回头一看，学生们在老远的后面呼哧带喘地说：“老师走慢点我们跟不上”。我才意识到现在的学生太缺乏锻炼了，所以该由老师带他们劳育，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这就让我想到当年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一下就明白了这实在是文艺复兴人的一个通俗而又精确的概括，而且就在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中世纪来自古希腊罗马的七艺里没有提到身体的训练，可是别忘了在我们的六艺里面射箭和驾车都是关乎到身体发展的。

我最后推荐一本我近读过的书，书名叫 The Polymath,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Leonardo da Vinci to Susan Sontag，讲的就是文艺复兴人的文化史。作者是剑桥大学的一位荣修教授和著名的文化史学者。我提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思考。对不起 Susan Sontag，但我想先把这个名字去掉，把书名变成填空题。文艺复兴人是从 Leonardo 开始的，而我想我们书院应该为现代文艺复兴人交上自己的答卷，我希望填上这个空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整体。

**铃木将久：**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讲的是艺术，但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专门艺术教育，而是我们所谓共同追求的书院性的新的通识教育。

## 第二场 校园内外的生活：以元培学院为例

### 3. 孙飞宇《田野作为教育：元培学院的社会实践课程探索》

**孙飞宇：**我今天要讲元培学院在过去两年时间中在社会实践课程方面的一些探索。过去几年由我负责社会实践的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心得，所以我的题



目叫做《田野作为教育》。我本人正好是社会学系背景，在此前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很多年，所以有比较多的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到了元培学院之后，我们希望把田野调查跟我们既有的社会实践课程结合在一起，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设法把田野调查融入到社会实践作为书院教育的基本方向。

我们在社会实践的课程当中，每年会邀请学校里面各个专业院系中坚力量的教授开设一系列针对新生的小班教学。在这些课当中我们特别鼓励教授带领同学们到外面的世界。比如，邓小南老师和张鸣老师带领学生们到杭州考古现场，张剑葳老师带领同学们到山西大同，等等。

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课程，同学们可以体验社会实践。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当中还有一个系列，叫做“现代中国”。这门课是从社会学系、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来开设。这个课程也作为这五大系列中的一个系列，是元培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我们对任课老师在设计课程时有个小要求，就是这门课程考核必须要包括一个小型社会调查。也就是说，这个课程中同学们当然会学到相应的理论和社会调查的一些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自己组队去做社会调查的研究。这是我们社会实践当中的第二个类型，就是在通识课当中所有的同学都必须学到的。

我今天特别想介绍第三个方面，就是暑期社会实践本身作为一门课。这实际上是在原有的暑期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做出的一门课程。中国大学一般来说在大一或大二的暑期都会有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的实践团，很多同学也会参与。但它往往会比较形式化，不够深入。很多同学参加这个实践团的想法，我们也比较清楚，就是相当于希望有机会去旅游。这往往会落得走马观花，既不够深入也没有实现什么教育的意义，更不用提什么实现教育的目的了。自2020年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实践课就要求一个学分。元培学院自己来设计再把它转变成一个必修课。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这门课做成以社会学的专业田野调查的方法。我们邀请社会学系的教师与从事经验研究的教师来讲授至少两次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建设了一系列社会实践的基地，而且所有的基地都要有明确的实践主题。学生在每年暑假开始之前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来报名不同主题。元培学院有六位院领导，每位都会出动，带队展开暑期的社会实践。每个团从10几个人到30个人不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院领导可能需要带两个团，所以也会邀请导师来帮助带队展开暑期社会实践。比如说，教育学院的刘云杉老师。刘云杉老师从事中国教育研究，就连几年都不断在带领我们的同学去陕西展开社会实践，主题是跟她自己的研究恰好搭在一



起，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教育问题研究。总而言之，所有的暑期社会实践教育团都以学术问题为取向，以专业的调研方法为基本的社会实践。在整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要求地方政府及相应接待方带我们真正进入到无论是农村里还是农户当中，或者是其他一线，就像专业的社会调研一样。我们也每天晚上都会召开非常热烈的讨论会。有时候我们做老师的都会非常感动，因为同学们会从晚上七点钟一直讨论到凌晨一点，消化讨论当天所遇到的问题与所做的访谈。在实践结束之后会要求每小组撰写调研报告，每一个小组会在一起开会汇总成一个报告。在十月或十一月份我们会举办社会实践报告的展示大会和比赛。最后优胜者会获得一定的奖励，应该是会给现金奖励的。给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些照片是我们在山东寿光的蔬菜种植基地和在浙江绍兴的村委会里跟负责人讨论事情的情形。





我们在总体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想法：让来自东部和南部比较发达的地域的同学去中西部比较贫困的区域，让从中西部地区来的同学去上海、深圳、江浙这些比较富裕的地方看一看。在专业化的调查当中，同学们就有了很多感触。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同学们对社会的认识有非常清晰的提高。下边的照片是我们在康师傅所建的基地当中。在上海，他们把我们带到商场中，请他们在商场中推销他们产品的一线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这些货架是怎么摆的，货架上什么饮料摆在什么位置，大概对应的销路是什么样的，就是帮助同学们去了解推销产品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做老师的感受也特别深，一方面是特别能够感受到同学们的成长，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同学们对自我的认识不断增加。他们自己也感动，看着他们热烈的讨论，我们也很感动。这是第三大类型。

第四大类型是培养同学们的责任感。这也是我们社会实践的一部份。我们会不断鼓励同学们去做各种校园服务、社会服务、各种大型活动等等。

最后一类是学生自主建设的组织。因为元培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师团队，所以在学院建设上是得力于大量学生组织的。这些组织里有德智体美劳等不同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学术学会”（简称“三学”）。他们在很多层面上帮助学院做了大量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会在校园内对同学们定期做相应的调查：调查哪一门课比较适合做为元培的通识教育课程？哪一门课的老师讲得比较好？哪一门课的老师讲得不太好？哪一门课更适合放在培养方案中？哪一门课不适合？等等。他们每一学年会形成年度报告。我们根据它进行讨论。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建议和结果我们都会接受。但我觉得他们有自组织的意识是非常好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年比较活跃的同学创办了叁拾伍圆设计实验室。这是一个设计小组。我们元培现在各种各样的 Logo、办公用品、空间设计都是由叁拾伍圆设计实验室所做出来的。他们做了很多特别有趣的工作。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组织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实践过程，同样对同学们的成长和学院的运行都非常重要。

我们每年会举办策划大赛，让同学们自己组成小组，提出策划方案，内容是怎么做会对学院更好。我们要求他们要给出具体的方案。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每个小组都要求给出具体的方案，甚至要给出预算，最后大家投票。得分最高的我们会帮助实施，所以学院里面的很多变化是由同学们提出与推动实现的。我们元培学院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确实能够体现出一个自由学习的共同体。这是元培学院现在对自我的称呼。大家得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 4. 李泊桥《以住宿制书院落实五育并举，实现本科教育的全人培养》

**李泊桥：**我们在住宿制书院中一直在探讨到底什么是更好的本科生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元培学院的整体教育理念和方法是专业的自由选择 and 年限的自由。我们想构建一个前瞻性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我们和专业院系的差别确实是在书院建设当中更加关注人格成长。我们在工作中确实能

感受到，很多同学都在焦虑、疏离和缺乏自信。蔡元培先生有句话：“尚自然展个性，化孤独为共同”。针对我们目前学生的孤独和焦虑，包括一些不安情绪，我们希望能通过书院共同体的建设来解决。目前在书院建设过程中，我们致力于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来塑造完全人格。我们通过书院实践教育探索一个完整的人和具备社会发展的公民到底应该具备什么基本素质，同时我们通过社团和俱乐部的建设来组织同学们共同参与整个住宿的生活。其中，培养学生自我成长与自我管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培养方案中围绕在德智体美劳设定了两个必修学分，64个学时书院课程。

在德育方面，我们主要落实公民道德建设，我们以立德树人为最主要的根本。在整个立德树人以及全人培养方面，我们特别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希望透过沉浸式的教育活动来提升同学们日常的道德品质和综合能力。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课程来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同时将学业和学校的体系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做到真正培养有道德、责任感的合格公民。我们在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同学们共同参与建设。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整个课程中建立起很多交流的平台，让大家有更好、更真诚的交流。

在智育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开发新的思维，提升综合能力，辅助学业发展。开设了一些课程来辅助学生学业发展，帮助他们做好学业规划，同时扩展国际化视野，提升学习能力和整个学术训练水平，也包括思维开拓的扩展。

要有健康的身体、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我们建立了很多以不同兴趣爱好为主的体育课程，让大家培养运动习惯，提升身体素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重身体素质的培养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如何结合起来。很多同学对身体的关注、对运动的了解都不太够，有些同学甚至没有这方面的习惯。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能够锻炼每个人的身体，弘扬体育文化，凝聚共识。

在美育方面，强调陶冶情操，提升审美。开设了包括轻松歌唱、扬琴、古琴、戏剧课、绘画。我们希望大家培养对美的理解与感受。首先我们希望透过陶冶学生情操提升审美能力，并基于兴趣导向来寻找我们共同的伙伴，建立整体意识，化孤独为共同。“轻松歌唱”这门课是我们去年面向零基础的学生开设的。同学们很多都没上过课，甚至没有上过台的经验。通过这门课程，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音乐是什么，在团队中促进人际交往。今年我们同时开了两门轻松歌唱课，分为基础班和进阶班。大家表演的时候都盛装出席，真正体会到课程能给大家带来的真实感受，从这个课程中来体会自己的内心成长。

在整个劳动教育当中，我们还特别希望同学们在劳动过程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同时感悟劳动的乐趣，树立劳动精神，培养主人翁的意识。我们把 35 楼建设、课程建设、生活技能建设都放在里面，提供劳动的体会和感悟这两个方面的成长。我们跟学校餐饮中心开了一门联合课程，叫做“美食圆桌汇”，这门课程在学校里深受学生欢迎。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在劳动这方面都不太愿意、也不太会。所以我们从同学们在食堂喜欢的菜品开始，帮助他们培养兴趣，提高技能。

在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制度方面，我们书院制度化建设，为的是让同学们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我们设立的新生训练营，长达一学期的新生讨论班，还有新生学科的讲座和导师面对面指导，在书院层面组织成为元培人书院实践之旅等新生适应性活动。这些内容都是用来支持同学们更好地融入专业学习，并把学习和生活更好地衔接起来。



再讲讲空间育人方面。目前，高校教育空间一直没有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我们希望能利用 35 楼学生宿舍整体建设中更好地支持元培学院的教育意义和理念。所以我们在书院空间里面建设了自习室、活动空间、多功能房，还有餐吧、咖啡厅。空间育人对我们来说是有必要的新尝试之一。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把空间育人的内容扩展得更为广阔，同时希望他教育的内涵也更加深入。

在全员育人方面，元培学院以住宿制书院为平台，整合教学系统和学生工作系统的力量，构建全员育人的新模式。学院全体老师都以班主任或导师的身份参与了住宿制书院的各项教育实践，开设书院课程，建立了教学-学工联席会制度，定期沟通学生培养状况，综合导师、学工、住宿辅导员、朋辈的力量



对学业预警学生和成绩波动较大的学生进行帮扶。广泛联络各方面教育资源，建立元培书院导师制度，诚邀杰出校友、校内各职能部门、社会各界杰出人士，共建书院育人课程。为提升学生的国际化能力，开拓国际化视野，提高综合素质，学院和国际合作部联合打造了《国际化能力提升理论与实践》书院课程。提升了同学们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境外学习能力。为促进书院审美教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学院以建院 20 周年为契机打造了书院荣誉导师制度，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公凯教授担任元培书院荣誉导师。

学院创新教育思路，引导同学积极参与书院建设。除了我们学院的老师们之外，还有两套重要的支持体系。一个是新生辅导员。他们了解新生日常的学业问题，为学生提供咨询和辅导，助力新生更好适应大学生活，找到自我发展方向。另一个是住宿辅导员。我们在校内率先推动实行住宿辅导员驻楼制。聘任思政能力过关、工作能力强、热爱教育事业、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的老师和高年级学生担任辅导员，参与组织书院课程的管理，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热情。住宿辅导员现在一共有 19 名，他们主要工作包括：指导书院课程和俱乐部建设，引导学生参与书院课程和俱乐部建设，催化学生共同体意识；关心学生住宿生活，定期走访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生活情况，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组织宿舍楼宇管理，负责宿舍基础设施维护、宿舍卫生检查，参与地下空间管理宿舍片区书院文化建设；负责书院共同体建设，引导学生参与书院管理，营造书院温暖“家庭”氛围。其中刚才介绍的叁拾伍圆设计实验室就是住宿辅导员在带。这是学生自我管理 and 建设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例子。我们希望在 35 楼建设上能够开发出一套自己的书院智能系统，目前已经到了 3.0 的版本，已经成为服务同学特别好的一个平台。目前我们书院的课程都是透过这个平台进行选课的。

### 第三场 打造通人：以新亚书院为例

#### 5. 张锦少《广大出胸襟：论新亚书院的通人教育》

**张锦少：**我代表新亚书院介绍一下我们书院对于培养同学全人发展的工作。我把它称为通人教育。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 1963 年，是香港唯一一所书院制的大学。我们新亚书院 1949 年创立，是由钱穆先生跟一群来自内地的学者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创办。我们书院的目标是继承我国著名书院讲学的精神，旁及



西欧大学讲师的制度以及人文主义的教育宗旨来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作出贡献。1959年，新亚接受香港政府的辅助，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由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还有联合书院组成。1973年，搬入现在的中文大学校园。

我们书院在宗旨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承宋明书院。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部分莫过于宋明书院。宋明书院是我们传统教育当中最值得保留的先例。钱穆先生也讲过，新亚书院的目标是培养通才。书院1950年的招生简章中这样写：“我们书院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学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明，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根据这个宗旨，我们认为求知识跟做人是同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同学们确实能做到这一点。我简单地把我们书院的理念整理成这个图。



第一，我们书院称作书院不称为学校，不称为学院。目的在于我们对于宋明书院的执着。第二，我们先求通识，再求专长。第三，我们强调做人的学问，以求学做人作为目标。

进入新亚书院的同学们要理解我们新亚的学规。《新亚学规》一共有24条，我们可以归纳几点：第一点，以人为本的教育；第二点，追求以博通广大为目标的人文教学；第三点，以培养通人、通才、通识为目标的学生教育。以下我想从通识、通才、通人这三个关键词来跟大家阐述一下我们新亚的通人教育理念。

首先是关于通识的部分。新亚创校的先贤仰慕宋明书院讲学的传统，在官学之外，开展以人为中心、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除了我们的老师亲自授课之外，也邀请名重士林的学者来讲学，如同南宋时期吕祖谦在鹅湖山邀请朱熹和

陆九渊开创了书院会讲之先河。我们创校时以这种模式进行学生教育。对于通识的重视向来是我们新亚书院的特色。但我们新亚所谓的通识并不等同于当前世界各地大学普及推行的 liberal education 或 general education。如果以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为参照的话，1963 年创校的时候，在课程编制上已经开设大学本科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但我们新亚继承宋明书院里面的通识理念，且 1949 年创校时已经确立了。我们提倡的通识不是特别的一门课程，而是以人为本，就是所谓以人物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它的重点不是专门的实用知识的讲授。

接着我讲通才的部分。已故中国著名哲学家刘述先先生说，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有身心兼顾、知情义并重的通识教育，中国传统一向重视通才胜过专技。他也说，一直到清朝在制度上仍然是官吏分途。“吏”是熟悉地方实际事务的专才，“官”则是在中央任命肩挑行政责任的通才。新亚书院 1950 年招生简章讲，只有人文主义教学可以救当时的教育风气。这个风气就是专为谋求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狭义目标的流弊。也就是说，新亚书院创立以来一直追求的就是一种通才的教育。其实，通才跟通人在某个意义上可以是相通的。我选用“通人”的时候，特意要强调我们书院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查了古籍会知道“通人”这个词早以前就有。讲得最多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其中对于通人的概念跟我们现在讲的非常接近，就是通明博见，博览古今的一种要求。我们希望学生能做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目标。

我们在通才和通人理念的指引下举办大量的学术与文化活动的。这些学术与文化活动都和中国文化有关。比方说，我们有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还有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等等。此外，还有以提升同学语文能力为目的的一些工作坊，如普通话、英语、日语等等。我们也有学期交换计划，和湖南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学校进行相关的交流活动。我们鼓励同学到世界各地去进行暑期实习计划。同学们也自行主持社团开展大量的活动，如国术会与国乐会，还有一些剧社、乐队还有社会服务的团队等等。最近十年来，我们全力推行“新亚青年学人计划的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这个计划 2013 年成立，宗旨是鼓励同学了解书院的使命和精神，特别是要加强对于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认识，从而得到全人的发展，成为一个了解当代社会并具备领导才能的年轻人。在一整年的过程中，我们会对我们的学员安排一系列与文化有关的各类活动。比如，本地历史文化的导赏团、两岸历史文化的考察团等，还有

一些关于中国文学、对联、历史、哲学、古琴、国画、中国书法的分享，还会培训他们一些社交礼仪、沟通技巧等等。这个青年学人的计划到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我们这个计划培养出来的同学后来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最后我把我们书院校歌里面的两句“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送给大家。它表达了我们的通人理想：有广大的胸襟，了解上下古今的历史，来对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 第四场“艺”的温故知新：以东亚艺文书院为例

##### 6. 田中有纪《“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论在精英教育中的音乐与体育》

**田中有纪：**我今天的题目是“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将讨论精英教育中的音乐和体育。首先让我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学生时代。我参加过学生合唱团，叫做柏叶会合唱团。它的前身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音乐部合唱团。“柏叶”来自于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的校徽图案。当时，因为大学把我们练习的地方改建成餐馆，我们失去了练习的场所，大学也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去找学校和校方进行交涉。后来大学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比较好的练习场所。我记得是大四的时候，我们的社团还获得了校长奖。这个经历让我觉察到学生活动自主性的重要。

我再举一个英国的例子。哈罗学校的校长说，如果你想了解这所名校的本质，你可以查一查他们的校歌。歌词讲述从入学到毕业整个四年学习的成长过程，而且主要是以体育运动为主要内容。所以，比如足球比赛等的体育比赛，声援队齐唱这首歌。在毕业典礼上也要唱。总之，学校里的各种节目都离不开演唱。这样，歌颂体育运动的歌曲在英国公立学校中广泛普及。不仅如此，还影响到了我们的旧制第一高等学校。

明治时期的学校教育非常重视体育。高校生做为近代运动的推手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重视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知道服从有条不紊的规则行事，也就是，通过体育运动来培养崇高人格。早期的一高把英国公立学校当成自己教养教育的典范。由外国教师进行体育运动指导，建立了棒球队、赛艇队等等，水平可称一流。推广体育运动的同时，歌颂高尚人格、赞颂人生的歌曲也陆续出现，成为代表校风的文化现象。和英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学校把体育

运动和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学生的体育运动通常选拔代表选手进行比赛。但有些研究指出，1930年左右，这种偏重于竞争的体育运动受到批评，从那之后，少数人从事的体育运动开始向多数人参与的民众体育运动转移，于是出现了大家都可以一起运动的体操。

一高的体育运动总伴随着声援歌曲。与之相关，一高音乐部所举办的音乐会也很重要。自1897年，民间音乐团体或者东京音乐学校在上野举办定期演奏会。一般民众接触西洋音乐的机会增加了，而音乐会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学生。所以就西方音乐在日本的建立来看，学生音乐团体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02年，一高成立了自己的音乐部，而日本第一个专业管弦乐团的成立是在1962年。学生音乐团体的成立竟然早于专业音乐团体。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学友会音乐部建立了管弦乐队，从德国买了乐谱和乐器，也是教授们帮着买的。1921年，他们举办第一次演奏会。在音乐部的历史中，也有很多学生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教授，比如，著名科学史家村上阳一郎（Murakami Yōyichirō）。他曾经强调乐团的成员不应该有专业意识。

我们再看看北大的体育和音乐情况如何。北大很早就有体育社团，比如说健身会和静坐会等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1922年举办的春季运动会。这是学校的领导和学者都高度重视的。《北大日刊》也专门发行了1922年春季运动会增刊。当然，蔡元培的体育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积极倡导军国民体育，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观点，强调“全员运动会”的教育作用。他倡导学校体育的普及性，反对学校体育中的选手制竞技体育。在音乐方面，北大音乐团于1916年成立，后来改称北大乐理研究会。这也反映着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就是非常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1919年，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改名为北大音乐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偏重理论，技术也专门化，成绩也不好。所以蔡元培决定由学校来管理它，并改名为音乐传习所，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和体育对学生人格的形成都是必要的。这种思想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一样。但是，根据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对培养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所以很容易和当时的理想主义相结合。武士道或者军国主义也是如此。现代学生扮演着领导、提升该国家该地方文化的角色。因此，提高技术的努力是应该的。虽然学生一般都只是业余爱好者，但还是要要有上进心，而他们那种非运动专业的精英体育人，或者非音乐专业的音乐教养人的存在实际上才很重要。我再拿蔡元培的例子。他说：“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他认

为现在的体育只关注优秀运动员，并没有致力于向更广大的大学生普及开来。于是，他重视运动会的作用，因为运动会能让不喜欢运动的人对体育产生兴趣。另外，胡适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他有一次观摩北大的春季运动会，回忆起他在美国的时候看过自己大学和另一所大学之间的足球比赛，不仅是学生，老教授也拼命给选手欢呼。

让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无论体育还是音乐都会和当时的理想主义勾连起来。我们的大学生都是将来领导社会的精英。他们也没有必要成为专业运动员、专业音乐家。但同时，技术水平也不能太低。就引导他们的教职工而言，他们要以“少年之心”来帮助学生们发挥自主性，形成良好的师生合作。

## 7. 高山花子《作为 liberal arts 的影片制作》

**高山花子：**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东大驹场校区进行的电影影片制作的经验。自2020年11月，我开始组织驹场校区101号馆影片制作项目。东亚艺文书院办公室在这个楼里。

三年前，东亚艺文书院刚设立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知道该楼当初是专门为中国学生盖的。大约是在1935年左右。如今，东大驹场校区以其 liberal arts 课程著称。驹场的教育可追溯到第一高等学校的时代。那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住在宿舍中。我们101号馆作为中国留学生专用教学楼，本身具有很复杂的历史和记忆。所以，石井教授倡议，以101号馆为核心，用特殊的叙述方式重现一高和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面貌。叙述历史，我们通常会采取文字记录或口述，而他所说的“特殊的方式”指的是，以影片的制作来尝试别样的叙述方式。我们通过公开选拔从博士生中组织了三个研究助理。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3月，我和他们一起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当时的学生留下来的日记。随后，我们决定聚焦于他们的认同和共同体归属感的问题。但还没有形成整体构思和框架。所以我们走访驹场内外，考察驹场的其他历史建筑，采访老教授，逐渐建构了叙述的线索。影片的故事从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学生的视角展开。他是研究1930、40年代第一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我们虚构出来这样一个学生作为主人公，由他来叙述故事。到今天为止，我们终于完成了声音方面的处理。后天，也就是3月18日，我们会举办首次内部上映会。

我们这个制作队伍只有四个人，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但是得益于这个“小”的特点，我们互相之间的沟通非常密切。下面，让我来概述一下这个影

片制作项目的特点。首先，这是跨学科的交流。影片导演是一个博士生。他的研究方向就是电影研究。但在影片制作方面，包括他在内，我们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我们彼此之间分享我们各自的知识，比如文学、哲学、史学、音乐学、摄影等有关的知识，也做了很多相互批评。这是我们在制作过程中的主要环节。第二，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关系的融和。我们的项目不是设立在正规课堂之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如导演、记录、演员、摄影，等等。我自己担任制片人。这种分工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崭新。我想强调的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互相融合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此外，我们有幸得到机会与专业音乐家和诗人合作：久保田翠（Kubota Midori）老师根据一高校歌，重新为影片创作了乐曲；森永泰弘（Morinaga Yasuhiro）老师负责设计影片的声音效果。这两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艺术创作的真实实践过程。一般的研究项目是不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的。

在东京大学，我们这样的影片制作项目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类似的例子。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尝试。我们也自然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们即将完成这一艺术创作项目。这是一个集体项目，也是团队合作。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恰恰是生活在大学里面，也是因为东亚艺文书院的“书院”模式中合作。我们的项目和学生社团不同，也不同于课程活动。教授的强力支持和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互动支撑着我们的项目。我认为，影片制作作为 liberal arts 的一个环节具有独特的潜力，而这取决于团队合作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有多种方法都是可以尝试的。我也希望在别的研究项目中再尝试制作另外一种影视作品。

## 圆桌讨论

**石井刚：**我从清华和北大的经验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所以我想请教两校的老师，中国近现代艺术的经验会对现代书院的建设或发展起到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李睦：**我们是有近代的学术、教学和教育的传统。这个传统往往把艺术教育作为实用性来对待。在更多的人心目中，会认为艺术是一个实用性的领域。所以他们在看待其教学作用的时候，难免会从这个方向去考虑，难免会把艺术归类到专业教育的领域。从学生的角度说，多数人也认为艺术和他的关系不大，所



以会认为没有用，结果会对艺术产生一种隔阂感。这也是我们现在做艺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困难所在。我想通过一个带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内容的课程来化解大家对艺术教育的误解。

**刘晨：**我在国外的時候系统地研究过文艺复兴的历史。但我本人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它对我思想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学成之后一直想做文艺复兴在 20 世纪在中国的接受。我有一些案例研究，比如说在上个世纪 20、30 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一些年轻学子去西方求知。比如说，蒋百里、傅雷以及胡适等等。胡适有一篇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也是发源于语言的。傅雷作为一个年轻学子，对于艺术史开始产生兴趣，后来又从事翻译。他的写作和翻译的风格都让我知道他能够贯通美术、音乐和文学，在不同领域之间自由翱翔。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正好也让我想到如何把这样一个思想的传统逐渐潜移默化到我的教学当中。傅雷刚从巴黎回来在上海开始教书的时候，根据他的讲稿而形成《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我小读这本书长大的。这本书让我知道，当我们在谈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我们不单单面对一个视觉材料，也可以打通很多领域。这也是广义上的文艺复兴给我的一个启示吧。我也把这套想法和灵感用到了我的教学当中。而且我发现这个还挺好用的。很多年轻的学生自己并没有建立联系，但是，当你鼓励他们去非常新鲜地观察并且勇于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潜意识中建立关联。他们读到了一首诗，比如有学生特别喜欢音乐，那么，一首乐曲都能够使他们对眼前的艺术品和音乐建立一种联系。广义上的文艺复兴打通各个领域。它的启发意义是很大的。

**石井刚：**元培学院学生的人数是一千多，这个规模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看，是多还是少？将来要往更多的方向发展还是维持现在的规模？

**李猛：**我刚看我们今年毕业生给我们交的毕业感受，叫“毕业之声”。其中有一条就是人多，人多成了一个元培非常好的一点。我们以前也犹豫过，元培最初的人数大概是现在的一半多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人数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这个人数刚好每年我们招生的上限，不能超过，超过了宿舍楼就住不下。宿舍楼的物理特点决定人数，我觉得没什么理论原因。但是，我觉得人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因为我们自己选专业，这样保障比如说历史、哲学这样相对选择

面较少的专业也能形成小的团体。也许石井老师的问题是，这么多人要做一个集体性的某些教学安排比新雅书院还要困难很多，为什么我们还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以及希望学生自由？如果是，我的回答第一个就是：这是北大传统；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和这个规模有一定关系。我们希望学生能在这里相互带领。我们学生在书院里面参与的部分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我们现在还是父爱主义太强了，就什么都给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我们希望，通过参与建设，同学们的责任感能大大增强，而且他们能理解你做的许多努力。现在我们的感觉是，越不参与的越会抱怨。就是，百分之20、30的学生由于各种性格的原因参与得不够，他们往往更容易抱怨。第二个我觉得不同类型的人相互在一起，会化出不一样的效果。中国大学这些年比较大的变化是研究性大学的建设，可能在整个亚洲都有这个特点。我们在世界大学排名中上升，但是随着学科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加强，现在大家往下延伸，希望从本科阶段就开始研究，尽早进实验室，尽早发文章，成为我们大学优秀的一个标准。通识教育、书院、人格成长等的许多建设都不太重要了。这并不是坏事，其实学生也在支持。但是，我觉得这样会给学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应该多创造一些环境让大家觉得在这里头可以有相互合作的机会。我感觉东亚文化在这方面有优势，所以希望形成一点对冲的力量。然后发挥出我们文化中的一些特质，还不至于让大家特别难受。这是我希望可以一起着手探索的地方。

**田中有纪：**我想向李睦老师请教一下有关非专业学生的艺术能力的问题。比如说画画儿，您对他们绘画的技术能力感兴趣吗？您认为学生的技术水平越高越好，还是水平本身没有重要性？在我的学生时代，东大有很多社团，但其中的水平参差不齐，也有的实际上就是在玩儿而已。我认为他们也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那么，在书院里面进行艺术教育，应该怎样要求学生技术方面的提高？

**李睦：**上我的课的同学们大多数都从来没有画过画儿，没有过艺术方面训练的经历。我更看重的不是学生的手，而是他们的眼睛。这个课要提升他们动手的能力、画画儿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提升他们观察和比较分析事物的能力。所以在技能和审美两个部分，如果有所侧重的话，我可能更侧重审美的引导。我更愿意让同学们通过绘画知道跟审美相关的，比如秩序、平衡、规律等等，还有很多甚至于破坏、构建这样的因素。我也认为随着同学们画得越来越多，他

们会逐渐掌握更多技术方面的规律，也会创造出自己的技术、绘画技巧、技法。这也是我特别想看到的。他们毕竟不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所以如果有所选择的话，让他们更多地开阔眼界。这个对他们将来一生的发展都会有好处。

**田中有纪：**我也想向北大的老师问一下问题。元培有很多种活动，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真的会去参加。但是，我现在考虑的是学生们的文化接受力的问题。比如说，从农村过来的学生和从城市过来的学生，他们的生活环境很不同。从小有条件接触到音乐和美术的学生，接受力可能更高一些。拿我自己当例子，我讲中国音乐史，来上课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她觉得除了她以外的学生都对音乐非常了解，她很难参与到课堂讨论。她自己后来跟我说，因为她从农村来东京，在音乐方面的知识相对于东京的学生，特别是从东京的私立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讲很缺乏，所以每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就会丧失自信。

**李泊桥：**五育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类似的问题。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对各个不同领域的内容掌握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从整个课程建设的过程中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不同层级的选择，希望同学们在不同领域都有不同的体会。就像我刚才举例的时候说，是要设置学分的。在高考制度的体系下，大家对于课程和兴趣爱好的界定是比较明确的。其实，好多同学可能在美育方面有基本天赋，甚至钢琴能够达到演奏级。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去教其他同学，通过帮助别人来成就自己的成长是很重要的。而对于不同的同学来说，提高更重要，甚至有些同学可能觉得自己不适合某一项，比如说音乐、画画儿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提供一些政策和体制上的支持希望他们做不同的尝试，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不同的追求，从而引导他们走向不同的阶层。所以我觉得技能的不同，或者地区文化的不同，都可以通过安排不同层次的课程来帮助大家更好地融入教育当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来建设自己的课程体系。为此，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有特长的同学，比如说钢琴可以达到演奏级的同学教初级阶段的同学，这样促进他们共同参与，加深对音乐的体会。

**柳干康：**我一直在日本读书，在乡下成长后来到东京大学读书，从那时就离开了自己的老家开始过一个人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大学除了在城市长大的人以外，大多数都在自己租房子住，会感到孤独。我也不例外。所以听到李泊桥老师说的“化孤独为共同”，令我羡慕北大的同学。如果我在

中国读书的话，真的想在书院跟大家一起读书。但同时我也觉得，孤独和共同之间仍然有较大的距离。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可能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猜想跟其他人一起生活也许会有些难度吧。如果这样，从孤独到共同的变化是不是会困难一些？

**李泊桥：**我们之所以现在把“化孤独为共同”这个说法拿出来介绍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同学们在入校以后就逐步建立共同体。这不仅意味着物理上住在一个楼里面，更主要的是一个生活、学习、成长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体系化的支持来帮助他们。在一方面，我们帮助同学们进行学业上的指导；另一方面，我们也成立了很多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和小组来帮助他们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相互沟通。所以独生子女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到了异地，他们需要朋友，需要支持。无论在大学还是在他们未来会面对的社会，与人交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在他们要摆脱高中时期的独生子女家庭环境进入到学校环境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培养自己的社会人格。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各个组织。我们也提供一定的措施，包括刚才介绍的新生指导员。我们还有住宿辅导员，生活、学业、心理上的问题，都可以跟他们进行深层的沟通。我们的院长说得特别好，说我们在学院里面就是在搭台给学员们唱戏。意思就是说，让大家共同建设这个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让每一个人参与到学院和书院的建设。只有参与和投入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有更好的成长和发展。之所以孤独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伙伴。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逐渐适应大学生活，到高年级以后再逐渐适应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生活。这是我们目前做的相关内容。

**铃木将久：**谢谢刚才柳教授的提问，不仅是针对北大，其他学校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青年的孤独和焦虑感也是东亚各地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还想多听一些其他学校的经验。

**张锦少：**香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因为汇聚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我们新亚书院也有很多国外的同学。所以我们要照顾的不仅仅是我们本地同学的需要，还有一些国际生或者内地生的需要。在我们的书院而言，我觉得住在宿舍的体验非常棒，而且也是非常需要的生活体验。此外，我觉得应该要有以融入文化为

本的教育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该以学生为本，让学生去体验香港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在哪里。比方说，有些国际同学对中国文化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会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日，比方说中秋节、春节的时候特别组织本地同学举办一些活动和国际的同学、内地的同学一起享受，这样，让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来了解本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对新来的国际学生，我们会给他们三天两夜的体验活动，也有由我们本地同学来组织各种活动。这些都是以学生为本。他们自主发挥，自主组织，都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人生中非常棒、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书院可以提供他们一些体验的平台。至于怎么体验，还是以学生，以人为本最重要。

**刘晨：**“化孤独为共同”是蔡元培先生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蔡先生是有他特殊的语境的。他指的“孤独”是有所特指的。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我觉得他所指的孤独可能是年轻人过于困苦于自己的小世界、小天地，找不到人生出路。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深刻，就是如何处理好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理解的切入点。放到我们的当下，就是一百年过去之后其实很多事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现在的人所面临的孤独可能是一种“人的境况 Human Condition”吧。我觉得大学、书院以及中世纪的修道院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而其存在本质上并不是要消除孤独。因为如果孤独真的是一种人的境况的话，我们是没法去消除它的。我在我的教学体验当中经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对学生们的感受，我要去判断这是人的境况层面的问题，还是他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出路的问题。如果是前者的话，我会交给他，让他去跟孤独相处。所以我想，也许我们的书院共同体也可以教我们的学生跟孤独相处，而不是彻底的去消弥孤独。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建立共同体和个体之间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

**张政远：**依我的了解，在以前的香港中文大学，书院与学系这两者的关系很密切。比方说，哲学系只有崇基学院和新亚书院的学生，艺术系就是只有新亚书院的学生。但是后来各方面变化很多，不知道新亚书院现在跟艺术系的关系怎么样？所有艺术系的学生现在还是新亚书院的学生吗？新亚书院和艺术系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

**张锦少：**从书院的角度来讲，书院和学系之间应该是有分工的。培训同学专业

知识的部分应该由学系来负责，培训同学人格、性格方面的训练应该由书院来进行。这也是我们中文大学特别突出的一个书院特色。过去有一些学系，特别是人文学系和个别书院关系很密切。比如说艺术系跟我们新亚的关系特别密切，只有新亚书院的同学才可以念艺术。比方说音乐，这是在崇基学院。现在大学方面越来越希望每一个学系都会有更多来自不同书院的同学能修读。但我们新亚书院楼上就是艺术学系，所以艺术学系现在还是在在我们新亚书院这边。我估计他们也应该还希望继续留在新亚这边。我们跟艺术学院的关系目前都还是非常密切的。这也是我们新亚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创作与成就还是比较突出的。

**张政远：**我也想问一下高山老师。把影片制作和 liberal arts 结合起来，的确是很重要的尝试。但是，实际上你们做的比我们预期的还要专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业余创作，但是，现在看来，几乎就是专业产品。我也高度赞赏你们的整个专业化努力。但是我想，这样做，我们还是要考虑我们书院的条件能否支持这种制作。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更要执着于业余性？哪怕我们缺少学术性，哪怕我们没有财政支持，我们也仍然可以制作影片。因此我想知道你如何想影片制作中的专业性。

**高山花子：**我认为，我们的项目还是十分业余的。看起来片子的质量很高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学习了很多经典影视作品的观点。虽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影片制作的专家，但是每一个人都看过很多经典作品，如希区柯克、塔可夫斯基、克里斯·马克，等等。我们试图模仿这些经典中的很多优点。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充分的时间制作这部片子。已经有一年半左右了。我想说的是，即便没有很优厚的财政支持，或者大部分都不是专业学生，只要有深度的交流、努力从电影研究中取经，还有相互批评，我们就可以完成高水准的工作。而且，这是和电影产业很不一样的地方。

**石井刚：**从财政支持的角度也可以说他们还是业余制作的。但是这个业余精神里面也包含一些专业的因素，也就是请专业人士参与进来。但是他们都是自愿参与的。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我们是做教育的，就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愿意参与到我们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要培养新的人才。我们经常问：我们在市场经济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去建设我们更好的大学教育？其实，我们



还是有办法，也就是让社会更多地了解我们所做的，然后请他们参与到我们的教育里。

**刘建波：**有些学院的课程是有教师参与的学院课程，但更多的是学生自我组织的书院课程。这个背后的逻辑大概是学生自我学习与组织并不单单是学生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觉得学生的实践过程在教育上也许会大于理论的收获。我想问，清华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课程方面是不是以比较有计划的导师参与的课程为主，还是学生自我组织的课程为主？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背后是怎么考虑的？

**赵晓力：**由我来回答一下清华的情况。清华还没有像北大这样有同学们发起设计的课程。两位老师讲的都是有学分的正式课。我们现在去设计一些没有学分的课。这就不进入学校选课地图，但是这些课到目前为止也都是由书院发起。我们以前也知道元培学生的主动性很强，所以，我们在新雅里面也提倡这种风气。但是两个学校的文化不同。目前看来新雅还没有元培那么注重。在劳动教育或者教学体系方面，新雅这边还是很有特色的。

**刘建波：**新雅的劳动农场是特别好的一个形式。我想也可算作书院课程的一部分吧。我们自己的书院课程本身也没有列入培养方案中，只是我们从方案里面拿出两个学分来，用来限定学生要做书院课程。我们有一套书院内部的选课系统。更多的部分还是学生跟老师交流或者学生作主。

**张锦少：**从新亚书院的经验来讲，我们应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计算学分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不计算学分的课程。关于前者，我们会提供一些课程。这些课程也是以人为本的。比方说，我们要求一年级的同学在第一学期每个礼拜五都要到礼堂去听一个 lecture。我们会从哲学、历史、建筑等领域，邀请领军的著名学者或者企业人士，跟本科一年级的同学分享讲论。还有一个课程叫做“学生服务计划”。我们给他一个学分，也有评分，让他们自己设计怎么服务香港外展义工工作。不计算学分的部分，刚才在我的报告里也讲了很多。我们有大量的交流活动。新亚有所谓的“四大活动”，都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包括每年9月的院庆，他们会组织1000多人参加的晚会。还有音乐会、戏剧比赛等等。书院会提供财政和人力的资源支持，但关键还是以学生为本。

这是我们新亚这七十几年来坚持的部分。

**刘晨：**我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普林斯顿是不实行学分制的。所有的课程都是按单元算，都是三个单元 3 units。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专业的学生，比如说你是物理系的学生，那么，你选修一门粒子物理学的课程和选修一门艺术史的课程都是同等价值的，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这样一来，学生可以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所选的课程，也会下同样的功夫。其实，这种做法在常春藤名校里也是很少见的。但我觉得确实是个很好的事情。

**石井刚：**今天把生活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然后从书院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也说了“艺”并不只是艺术的意思。我们如何去想象这个“艺”字的意涵，我们也可以站在不同的传统里提炼出有效的资源来，重新想象一下“艺”的含意，以及它和书院之间的关系。日语里面有“文艺”这个词，大概是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学之意，似乎与汉语的“文艺”略有区别。“文”和“艺”两个不同的词结合起来会产生新的意思，因此，“文艺”是非常辩证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今天清华的经验、北大元培的经验，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都包含很多社会实践或者是自己动手的意思。我认为中国的“文艺”概念也跟这个息息相关。那么，自己动手做的“文艺”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通人”。但这个通人不是说专业上技术多么高。我们还是至少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支撑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与人分享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来做，这必定要包含共同性，绝对不是一个孤独的工作，而是和其他人一起做才可以充分把自己双手的劳动释放出来。这些都是我从中国的历史中学到的。我想把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应用到我们的大学教育中来。希望今天聚集起来的各位老师以后都可以继续分享与讨论我们教育的经验和学问，要打造我们自己更好的未来。非常感谢大家。

（录音整理：石井刚、郭弛洋）



## 艺以为学：东京大学的“教养” 与东亚艺文书院的探索

石井刚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东亚艺文书院副院长)

### 1. “教养”及其命运：日本通识教育历史管窥

今天的东京大学是在二战后全国学制改革当中于1949年从原来的东京帝国大学改称而成立的。从旧制大学到新制大学的转型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旧制高等学校收编到新制大学的基础教育部门，开始承担四年本科教育中为期两年的“一般教养课程”，即通识教育课程。旧制高等学校作为中等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之间的过渡阶段，为志愿在大学里深造的学生进行预备教育。其中，全国仅有八所、以从第一到第八的序数起名的高等学校被誉为精英的摇篮。特别是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位于首都东京，其毕业生多为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日本顶尖最高学府的学生，国家栋梁级的人才比比皆是，名望颇高。该校在此学制改革中被并入东京大学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举措。但收编的方式有些别致，也就是，它单独成立了一所独立的学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学部”系本科教育的基本单位，相当于学院。也就是说，教养学部不单单是一所提供通识教育的机构，它既担任东京大学所有本科1、2年级学生的通识教育，也要为3、4年级学生提供以“教养”为内容的专业教育。这是别的任何一所国立大学都没有的独特安排，为后来至今的东大人所深感自豪的一大特色。<sup>1</sup>“教养”一词应为英语 culture 的翻译，同时也有浓厚的德语 Bildung 意味，是指以获得广大学术知识和高尚道德人品兼而有之的高

<sup>1</sup> 今天，埼玉大学也设有教养学部。但它成立于1965年，与学制改革无关。

贵精神为努力方向的生活态度以及其成就。20世纪初，在经济繁荣、文化成熟的氛围下，日本社会出现了“教养主义”。旧制高校学生便是浸染于此主义的主要人群，沉迷於各类哲学书，高谈学术而乐此不疲。“一高”的学生自然不是例外，而应该说是最能体现出教养主义精髓的佼佼者。改制之后，东京大学所有的本科生在其1、2年级阶段时一定要在教养学部接受教养教育，但相比於一高时代，学生们接受教养教育的时间缩短了1年。

新制大学所设立的“一般教养课程”中的“一般教养”应该是英语 general education 的翻译词。但东京大学的情况有所不同。承担一般教养课程的教养学部也是一个独立的学部，除了承担1、2年级通识教育之外，还设有本科3、4年级的专门教育课程以及研究生教育课程。因此，“教养”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超出 general education 所指的范畴。那么，教养概念究竟包含什么意义，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所提供的教育应以何等理念为寄托？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一直以来为历代学者所反复讨论的思想课题。首任教养学部长矢内原忠雄（Yanaiharu Tadao）曾经主张：教养学部的通识性质本身就是综合大学的核心意义所在，教养学部成功与否将决定新制东京大学作为综合大学的成败。<sup>2</sup>这句话针对的应该不是一般教养教育。矢内原认为，综合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以教养教育为主。新制东京大学的9所学部（法、文、理、工、医、农、经济、教育、教养）中，教育学部和教养学部之外的7所学部都从东京帝国大学继承下来（教育学部系1949年新制大学成立时新设），在新制学部制度下，本科教育的时间从原来的3年缩短为两年。<sup>3</sup>这样，东京大学的本科教育由两年一般教养课程和两年专业教育来组成的为期4年。这意味着，不仅一高3年的教养教育缩短了一年，专业教育也比之前短了一年。因此，一高改制为教养学部的举措，就从教养学部的角度而言，实际上是实施教养教育时间的扩大。学生只要升3年级的时候选择留在教养学部，就可以在整个4年本科教育阶段一直浸泡在教养教育中。可见，相比于东京大学其他任何学部，教养学部的特色非常明显，也就是，本科4年就是提供通识性质的教学。曾担任教养学部长的本间长世（Homma Nagayo）则认为知识的丰富之外，知识、审

<sup>2</sup> 嘉治元郎、恒川隆男、渡辺啓、船曳建夫、本間長世、芳賀徹、岩本振武「座談会 教養学部を論ず その現状と未来」、『教養学部報』1985年4月16日。

<sup>3</sup> 医学部除外。它采用了4年专业教育课程，也就是和前两年的一般教养教育课程加起来，要求学生接受为期6年的本科教育。

美、伦理各方面的判断能力以及以此为生的生活实践能力都是“教养”概念所包含的意义。<sup>4</sup> 教养学部的出发原来承载着这样的理念。

但事与愿违，随着日本社会实现了经济高度增长，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大学教育也顺利得到大众化，而大学教育当中的一般教养课程的意义并没有得到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支持。除了东京大学之外，其他大学都没有教养学部，一般教养课程自然就被认为是专业教育的附属品。在东京大学，其实情况也差不多。对选择上帝国大学遗留下来的 8 个学部的大部分学生来讲，1、2 年级阶段在教养学部度过，普遍接受一般教养教育不一定显得有意义。因此，“教养的意义”反复成为教养学部师生的共同问题。大概是在 1980 年代以后，以片假名“リベラルアーツ”诠释教养二字的例子增多。这是 liberal arts 的音译，相对于“教养”二字，除非了解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读者无法体会其意涵。于是，“liberal arts”和“教养”之间从此形成了暧昧的重叠关系，“何为教养？”的问题扩大至“何为 liberal arts?”，延续至今。有意思的是，本来在西方教育传统中有明确定义的 liberal arts 在日语语境中反而有待解释的概念。我并不认为这种日语外来词的暧昧性不好，而是想强调，正是这种暧昧性为刷新 liberal arts 概念提供广大的想像空间。下面会有详细论及，暂不具论。

1990 年代初，大学制度迎来了又一次大规模改革的季节，政府“大学设置标准”的改革激发了全国国立大学纷纷撤销一般教养课程的浪潮，几乎所有的学校把自己的一般教养课程改变为新学部，从此，二战后民主建设的几十年中发挥作用的大学一般教养教育基本消失了。惟独东京大学却没有随波逐流，不仅保留本科 1、2 年级学生都要在教养学部接受教养教育的本科培养方式，还加强教养学部的研究教育功能，高举 liberal arts 的旗帜，发展以跨学科研究为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在 1995 年前后，教养学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研究生院、本科 3、4 年级专门教育以及本科 1、2 年级基础教育课程三层结构的特色学院。今天，教授和副教授加起来大约 280 名左右的教学队伍都既承担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也负责本科 1、2 年级的通识课程。这表明，高端的研究和基础教育完美的合一成为了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走向世界的基础条件。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所继承的旧制一高基因不只是其教养教育的学风。1949 年成立至今，它仍然坐落在曾经的一高旧址——驹场校区。东大的教养，或者 liberal arts 和驹场的校园文化密不可分。各种学生社团活动和课外体育运动

---

<sup>4</sup> 同上。



在驹场校区开展得非常活跃，校园里弥漫着浓厚的青春文化色彩，而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当中，学生宿舍的保留以及后来的废弃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一高时期，其精英文化集中体现在住宿式校园。校区内的学生宿舍“驹场寮”构成一高学生自我认同的核心。学生们都住在寮中培养了生活自治的传统。在新制大学机制下，教养学部依然维持驹场寮，寮里的学生自治也依旧保留。但是，教养学部毕竟已经不是一高，东京大学所有的本科1、2年级学生都要接受教养学部基础教育的新体制下，全员住宿这一旧制一高认同的核心已经难以维系。一高的教养是一种生活方式，即寝食与共的生活当中逐渐习得文化修养的成长过程便是教养的重要意义。但新制教养学部已经无法做到全员住校，教养的意义不免受到窄化。我窃以为 liberal arts 一词自1980年代增多起来用以诠释教养，是有一定的历史缘由的。也就是在东京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教育当中，教养教育的地位逐渐低下的结果。换句话说，随着一高变成教养学部，教养的全人教养意味走向式微之途，取而代之，出现了 liberal arts 的呼声。当时在技术化的金融资本主义趋于烂熟的日本社会条件下，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都只能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教养理念的催生便成为了教养学部老师们共同的中心诉求。他们开始要在 liberal arts 的名义下重新整合教养的优良传统，再给东京大学的教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内涵，以期回应时代的要求。这个努力是成功的。如上所述，1990年代的新一轮大学改革虽然促使全国大学纷纷取消一般教养课程，但唯有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不但保留下来，而且更加发扬光大。经过1990年代的变革，“驹场的 liberal arts”遂成为了引领日本人文知识潮流的大本营，其名声也流传在广大的国际学术界。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驹场寮已经蜕变成成为教养学部自我改革的绊脚石。寮的学生自治长期以来阻碍着校方工作的介入，宿舍楼的各种设施和建筑本身呈现老化，巨大的占地面积更是限制学部推进校园优化政策的主因。教养学部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号召下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研究生培养机制和国际先进研究机构的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它为了贯彻以 liberal arts 为旗帜的新的学科建设目标，决定撤销驹场寮，就是势在必行的决策了。2001年夏天，在机动队（即武装警察部队）守护于校门外的极度紧张氛围中，驹场寮同意撤出，就此结束了长达65年的历史。

驹场寮的消失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驹场寮问题恰好与“驹场的 liberal arts”的兴起同步出现。随着亚洲地区的经济高度发展以及西方世界走向后现代的时代趋势，改革大学的呼声在日本国内应运而生，使得教养学部获得加强

其研究和教育的好机会，加大重新整合的力度。以 liberal arts 概念来取代教养概念在此形势中不能不意味着一高遺產的清理。教养概念在 20 世纪初帝国内体制下的经济社会走向成熟的文化氛围中普及开来，虽然其有很高尚的理想主义意味，但长久以来也受到批评，如著名哲学家三木清（Miki Kiyoshi）在 1930 年代时代告急的情况下对其去政治化的特征进行过锐利的批判<sup>5</sup>，到了二战末期，哲学家田边元（Tanabe Hajime）也在一次讲演中谴责一高的文化氛围违背于战局的严峻形势。<sup>6</sup> 一高学生将以驹场寮为中心的校园生活视为他们作为精英的骄傲，自我封闭在驹场校园中，与尘世隔绝开来。他们把这种生活态度称作“笼城主义”，认为这是使他们保持清高的正确态度。<sup>7</sup> 战后，教养学部继承一高以来的教养传统，教养教育在新制大学教学体系中重新得到了定义和意义，“笼城主义”不再是教养学部学生的自我认同基础。驹场寮的自治传统却保留了下来，于是，与新的教养教育之间形成了一种暧昧的关系，最后蜕变为难于相容的矛盾关系。教养教育在驹场由教养学部来注入了新的意义和活力，也以一般教养课程的形式在全国大学中普及开来，但战前教养主义的弊端反而失去了受到反思和克服的机会。一般教养课程的崩溃也许就在教养学部成立的时候已经是不可逃脱的命运了，而 liberal arts 替代教养概念兴盛起来的新潮流更是预示了驹场寮废寮的必然。如果再大胆发挥想像力去想，为什么需要更新教养概念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选取了一个外来词，并把它直接音译过来，那么，让人想到战后民主主义的不彻底性导致这种情形的发生。也就是，公民意识和政治主体意识的淡薄依然作为悬而未决的课题从战前教养主义的时代留存下来，因而只能以片假名令人半懂不懂的暧昧性来表达新的教养，并把它当成一种未来的目标。

## 2. 教养的国际化

21 世纪的开端对驹场教养学部来讲也意味着又一次发展机遇的到来。在

---

<sup>5</sup> 三木清「教養論」、『三木清教養論集』、講談社、2017 年、p.109。

<sup>6</sup> 田邊元「文化の限界」、『田邊元全集』第 8 卷、筑摩書房、1964 年、pp.265-305。

<sup>7</sup> 东亚艺文书院组织博士生拍摄一部电影作品《笼城》（小手川将导演，2022 年），专门记录了一高学生“笼城主义”的作风。相关资讯可参照如下网页：<https://www.eaa.c.u-tokyo.ac.jp/projects/first-high-school-materials-archive/rojo-trailer/>

后冷战全球化形势下，东京大学致力于加强与东亚各国顶尖大学之间的合作，与北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以及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之间订立了四所大学校长年会论坛（“BESETOHA 东亚四大学论坛”）。其中心议题是要向东亚地区推广作为 liberal arts 的东京大学教养教育模式。东京大学由教养学部来承办相关事务。该论坛从 1999 年持续到 2014 年，此间，北京大学和首尔国立大学分别成立了元培学院和自由专攻学部，都以 liberal arts 当作办学特色，如今都享誉国内外，为广大社会输出优秀的通识人才。

近年来，中国国内出现有多所大学兴办书院的例子。顾名思义，这也一定从香港中文大学以书院为校园生活基本单位实行全人教育的经验受到了启发，当然也作为古代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等书院共同体的当代版，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增添了新的景观。在标榜书院式教育的北大元培学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等的实践当中，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两大共同特色：以通识教育为主的教学体系以及住宿式学院的全人教学模式。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废除驹场寮后十几年，东亚各地的 liberal arts 学院却重新认识到住宿生活特殊的教育意义，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书院之风。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也在全球化形势当中发挥了 liberal arts 跨学科性质的独特研究风格，加强哲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东京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UTCP）2002 年在驹场成立，凝聚了教养学部 1980 年代中兴之后一直带领驹场 liberal arts 学风的骨干学者，广泛开展国际交流。UTCP 的哲学与其说是学科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跨学科的、广义上的学问。文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其中，所组织学术活动多以跨学科的主题讨论形式举办。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本着 liberal arts 理念（也是“教养”概念的引申发挥）进行教学研究的驹场教养学部特点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 UTCP 国际研究交流的基础上，2019 年，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签订了新的研究教学合作，起名为东亚艺文书院（East Asian Academy for New Liberal Arts）。这是 UTCP 和东亚四大学论坛积累了多年实践之后实现的新一步重要举措。东亚艺文书院提倡“从东亚提倡新的 liberal arts”。这一理念正集中体现着东大教养学部进入 21 世纪以来与东亚兄弟院校一起合作培养起来的学术理想。东亚艺文书院与北大的合作包括从最新的研究到本科教育的大学研究教育的所有环节，尤其是本科教育便是重中之重。2020 年，东大教养学部和北大元培学院这两所在各自大学里承担 liberal arts 教学的单位同时开办东亚研究联合课程，开始招生并进行互相交流，共同培养东亚通识人才。该

课程在东大教养学部称作“东亚教养学”，旨在继承旧制一高以来的教养教育优良传统，将教养理念提升为可以迎接新的社会条件的新的学术理想。

### 3. 东亚艺文书院的教学与研究

东亚艺文书院的名称起自《汉书·艺文志》。作为东亚最古老的目录，《汉书·艺文志》囊括当时所有的学科类别。如果套用今天的说法，便是不分文理的综合学术体系。这种综合性略近於当今世界各大学中常见的 Arts and Sciences。但无论 Arts and Sciences 还是 liberal arts，都是欧美现代大学制度下逐渐形成的制度。虽然我们并不拒绝西方现代性而推举所谓东方传统，但我们的知识结构限制於“拿来”的知识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更何况今天现代价值在各种复杂的当代人类社会条件下受到严重的挑战。当下的危机波及全人类、全世界，既然如此，热爱智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以人类走到现代的宝贵遗产为共同基础，再去努力寻索崭新的思考资源，并组织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概念，以提供别样的世界想像力。作为东亚土壤上生活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地气”地去从事这个工作。于是，我们提倡“从东亚出发的 liberal arts”作为核心理念，并把它寄托到了东亚最古老的综合学术目录之名，旨在建设“接地气的 liberal arts”。

那么，何为“接地气的 liberal arts”？其与“东亚”、“书院”的关系又何如？

首先是“东亚”概念。我们讲究“接地气”并非只指立足于东亚文化传统。根据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传统不是现代性的对立面而是从现代内部创设出来的。显然，我们哪怕再渴望要回到所谓的传统，但它一去不复返。传统只是从我们深深地嵌入于现代的视阈里面展望才能形构出来。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抛弃现代就能发现未被现代玷污的美好传统，而重要的是首先要有充分的自觉，认为我们无论是其知识和精神还是情感和身体，都受制於现代性，甚至欲求现代性。这是我们的现状，也是出发点。诸如儒释道之类的所谓东亚传统也并没有独立于我们的这种现状；同理，所谓西方也并不只是遥远的他者，而我们认识世界时所参照的语言足以告诉我们：西方历史文化往往会比东方传统更能解释并指引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东亚”概念的内涵无非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内外相遇相融的经验本身。那么，“东亚”由哪些元素组成，尤其是一种什么样的地理概念？一般认为，东亚是由日中韩三个文化圈域组成的地区。如果把儒释道及汉字等视为其共同的文化内涵，那么，越

南和新加坡也应该被纳入进来。但这种界定会抹煞该地区内部的多样性和跨界流动性。而且，虽然往往被忽略，但应该最重要的是，内含伊斯兰、蒙古、西藏等等不同宗教、文化、生产方式的中国本来就无法框定在所谓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等东亚话语中。不管如何界定东亚，其内部总有与之不甚协调的异质成分，因此，我们讨论东亚首先需要把东亚的不可确定性本身当作出发点。

历史也是不容忽视的“东亚”成因。“东亚”这一区域观念与日本19世纪末以来开始的，伴随军事力量而生的殖民帝国主义历史进程之间总有纠缠不已的关联。过去二十年左右，常有人透露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东亚共同体”的愿望，但一有这种声音，立即就会有人指出该地区仍然没有得到和解，没有具备欧洲那样建立共同体的条件。至此，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提出并承担东亚概念，就自然需要首先反思我们的现代经验，而在这里所说的现代经验就是，如“大东亚共荣圈”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该地区的现代化历程所经历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当时的日本思想界以克服现代性为名提出的批判哲学，还有在此过程中重新被抬举出来为联结“东亚”地区被当成精神纽带的东亚传统价值。既然要进行反思，我们也必须站在我们的具体经验上来做，在此，“接地气”的思考态度才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我们的反思应该立于具体的生活现实以及对这种现实的解构式批评介入。东亚艺文书院的研究和教育因而并不局限于指向以东亚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而是要从东亚这一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师生都赖以生活的土壤出发去培养面向普遍性的学术态度，并且我们将提供这种实践和培养的空间称为“书院”。在东亚地区，书院办学由来已久，宋朝时期四大书院吸引各代名儒聚徒讲学，出现了如“鹅湖之会”那样的重要学术论战，为后来东亚学术传统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哲学到文献学（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风气颇浓的清朝考证学更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各地书院盛行的产物，学者在那里得以自由沟通，互相切磋。到了现代，书院更是在特殊的时代要求下为学者提供各式各样的问学平台。香港的新亚书院无疑为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1980年代在北京开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也富有特色。笔者没有做过系统调查，并不知道在历史上曾出现的无数个书院当中，官办书院和民办书院谁居多。但无论如何，开放性、前瞻性以及共同体性应该都是这些著名书院都具备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说，好的书院应该是广泛吸纳不同立场、不同背景的广泛学者，特别是具有最高成就的杰出学者，与他们分享一个共同的平台，在那里相互切磋，而且也在此开放的平台上，将为学问所吸引而成的友情当作唯一纽带，以求学者共同提高，并凭借人



文智慧去应对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东亚艺文书院也在继承历代伟大书院的这些共同特点，力求与全球各地学者建立学术合作关系，敢于面对困扰人类的时代课题，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探寻想像力的资源共同走向未来。作为我们的学问得以开展的空间，书院的形式极富东亚特色。但我们的书院更希望与世界相互联结，成为本土性和全球性相交错の学问平台。

东亚艺文书院 2019 年建立伊始就设置了四个研究模块：“世界哲学”、“世界历史”、“世界文学”，以及“未来社会的环境与健康”。前三者的设置表明我们试图更新文史哲学学科结构的意愿。近年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已经成为显学。无须赘述，它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出现的文学研究方法上的重要突破。但与其反思全球化趋势的问题意识相反，似乎尚未真正摆脱英语中心的惯性。因此，从东亚的视角介入世界文学自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世界历史由东亚艺文书院首任院长、伊斯兰文明史专家羽田正（Haneda Masashi）带动，要克服以国别历史或区域历史为单位的以往历史叙事的同时，也在探索一种不同于以英语世界为重心的全球视角的新世界史方法。世界哲学则为现任院长中岛隆博（Nakajima Takahiro）和希腊哲学专家纳富信留（Notomi Noburu）一起提倡。类似于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它也在寻求打破国别或区域性的哲学分类以及比较哲学的方法，但其挑战性或许比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还要巨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里存在“何谓哲学？”的老问题。世界哲学的提倡能否成功？这取决于哲学概念的自我更新。如今仍有“中国没有哲学”等的说法出自西方学者。<sup>8</sup> 这一句话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并不单纯。因为它在叩问“中国哲学何谓？”的同时，也在反问“哲学是什么？”。证明非西方世界也有哲学的努力如果做不好，就会抹煞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哲学方式存在的可能性，或者把非西方世界丰富的哲学要素改造成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类似物，使之永远甘于西方哲学似是而非的附庸地位。

这三个以“世界”为题的研究模块与“未来社会的环境与健康”研究模块相互参照，要回应诸如全球性环境危机、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高新科学技术将会带来的伦理困境等时代社会问题。这样，我们试图从东亚的土壤中培育出新的学问。但新的学问不仅以研究方式体现出来。至少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教育。“从东亚出发的新 liberal arts”所包含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就是以

---

<sup>8</sup> 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文史哲》2002 年第 2 期（总第 269 期），pp. 5-8。



“东亚教养学”课程为平台的教学理念以及方法的实践。该课程作为辅修专业课程 2020 年在教文学部成立，以公开招生的方式从全校学生选拔 10 名学员。在教学的内容和方式而言，该课程有三个特色：第一，学问应以文本为基础，文本阅读，特别是经典作品的阅读是我们在课堂中最为重视的实践。这也是对哲学，即 philosophy（爱智慧）和文献学，即 philology（爱语言）之间相得益彰关系的重视。如果要确保哲学实践的主体间性，我们一定要借助于文献学的环节。正如 August Boeckh 所说，文献学是一种“认识被认识到的事情（knowing what has been known）”的功夫。<sup>9</sup> 哲学思考经过书写的媒介作用才能获得重生，而文献和思考的相互作用无非就是涵养热爱智慧的友爱关系。这也可以理解为“以文会友”的东方传统。因此，在课堂上阅读经典作品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共同经验来体会学术思考本身的群体性以及与他者共处所带来的愉悦。《论语》开篇两句话，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的道理是深刻的。“东亚教养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共享经典文本，以求学问的“悦”和“乐”。第二，“东亚教养学”课程里除了东京大学的学生，还有北京大学的学生。东大的学生也不一定都是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同学。我们尽量吸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因此，经典阅读课程的工作语言为英语，而且参加课程的学生都被要求英语、汉语和日语三种语言兼通。东大教文学部 2013 年开设了三语人才培养项目，叫做 TLP（trilingual program），对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学生进行选拔，让他们从零起点学习汉语，培养英汉日三个语言都可以娴熟运用的精英人才。“东亚教养学”课程是从 TLP 延伸出来的课程，要求参加选修的学生该具备相当于 TLP 结业水平的语言运用能力。穿梭于不同语言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自然很重要，但我们要求如此，更重要的理由不止于此。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真理只在翻译过程中。<sup>10</sup> 翻译是一次冒险，但没有这种冒险，我们恐怕难以触摸到普遍性的端绪。第三，学术讨论的多极化。传统课堂都由老师来支配，正确答案总掌握在老师手中，教室的秩序在这种权力关系下才被认为是正确的。但 lib-

---

<sup>9</sup> アウグスト・ベーク『解釈学と批判：古典文献学の精髓』、安酸敏真訳、知泉書館、2014年、p.16 (August Boeckh, *Encyklopae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sup>10</sup>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lluminations*, Harry Zohn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77.

eral arts 式的学问从一开始就排除唯一正确的答案，正如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讲，教师在教室中的职责应该就是要解放学生的知性。<sup>11</sup> 为此，我们尽可能地要避免由老师一个人垄断课堂的局面出现。具体来讲，有两种方法：在讲解的环节中，邀请另一个老师，课堂运作由代课老师和应邀老师两位共同担任，让同学们知道重要的不是要到达唯一的答案，而是了解事情的复杂性以及敬重他者的重要性；除了老师主持的课堂之外，还设有博士生进行辅导的环节，好让学生们与年龄相近的学长们一起讨论一个文本，学会阅读的多样性之同时，解决阅读文本时会碰到的技术性问题。

#### 4. “艺”的重建：后疫情时代的 liberal arts

如上所述，“东亚教养学”课程成立于2020年，也就是新冠病毒感染症正爆发流行之时。国际间的人员来往从此就无法指望，驹场校区也经历了全面封锁，全面实施线上授课。在这个危机当中，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具身体的交流在学问上具有的重要意义。大学教育以校园生活为其基础。疫情之前谁都没有质疑过的这个常识却受到了严重的检验。如果学问的意义仅止于教室中的知识传递的话，以线上授课为主的虚拟校园就足以满足其目的。但科学研究的成就取决于来自实验室之外的某种偶然性因素。这也是韦伯在《作为职业的学问》里论及过的。按他的意思，科学探索的激情由“灵感（inspiration）”支撑，而后者不是计算理性所能产出来的，也就是，不是关闭在实验室中能得到的，它是要到来之物。<sup>12</sup> 由是而推，课堂上的教育不可能就在课堂中得到圆满。学生要把在课堂所学的内容消化为自己的学问经验，还需要来自课堂之外的某种偶然的“灵感”。灵感的来源有可能是课前课后（或许甚至在上课之中）和同学们闲聊、在食堂吃饭、坐在校园的草坪上休息、夹在图书馆的书架中间徘徊，还是在某天上学路上与陌生人偶然相遇……。这些看似琐碎甚至多余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恰恰是线上授课所无法提供的灵感来源。但也恰恰是这些才为我们做

---

<sup>11</sup> ジャック・ランシエール『無知な教師』、梶田裕・堀谷子訳、法政大学出版社、2011年、p.19 (Jacques Rancière, *Le maître ignorant: Cinq façons sur l'émancipation intellectuelle*)。

<sup>12</sup> 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職業としての学問』、尾高邦雄訳、岩波書店、1980年、p.23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学问提供最宝贵的营养。科学研究需要灵感，那么，我们的 liberal arts 更需要那些种种生活琐事，化之为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的就是因为，我们讲求的 liberal arts 无非就是教养，也就是我们以之陶冶我们的人性，习得更好的人文精神，并为人类幸福生活的建设提供智慧的指引。所以，校园生活应该是我们大学，尤其是 liberal arts 的学问所赖以成立的最基本条件。学问绝不只是知识和信息的传递，也不是只在教室里如阅读、讨论、实验和实习等实践中获得圆满，而必须要动用五官和情感来感受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与其中的生活。在疫情当中，人们退居家中，工作和社交都借助于网络技术进行。用不着参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控诉，人们似乎都忘记了情感和礼仪相互作用的人文生活。这实际上也是大学的危机，因为，大学本来就是可以让人们以述行性质（performative）的语言扮演“似乎（as if）”如此的行为角色的空间。<sup>13</sup>

根据如上反思，我们从2020年夏天开始策划开办一个动手创作艺术作品的工作坊，具体来讲，组织不同领域的博士生建立一个摄影小组，让他们创作一部电影作品。东亚艺文书院的办公室坐落在旧制一高1935年搬迁至驹场的第二年竣工的一栋老楼。它是当年为“特设高等科”的学生专用的教学楼。“特设高等科”系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置的大学预科课程。东亚艺文书院的成立重新让我们记起了这段历史。我们也从而开始整理并研究战后七十多年没有人整理过的特设高等科留学生管理档案。该教学楼基本完整地保留建筑当时的样貌，也是日本现代建筑史上的重要建筑。于是，我们开始设想如何把“特设高等科”的历史和这幢老楼都要做成综合档案，而我们的共同希望是要把档案制造成为有人文生活气息的留存库，试图表现出我们寄托到新的 liberal arts 的愿景。我们坚信以 liberal arts 为标志的学问必须要人感到人的体温，在线上授课盛行的网络技术时代更应该如此。这种初步的设想经过几次商量，遂发展成为拍摄电影，也就是将制造档案的工作以创制电影作品的方式来展现出来。这个制片工作坊由三个博士生组成。他们的研究方向各异，分别为电影理论与批评、档案和教育思想，以及一高历史。由东亚艺文书院助理教授、研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思想的高山花子（Takayama Hanako）担任制片人，在疫情中受到活动限制的条件下，从策划到完成前后耗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制

---

<sup>13</sup> Jacques Derrida,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 *Without Alibi*, Peggy Kamuf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15.

作了一部 65 分钟的电影。这个工作坊项目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作品本身的质量如何，而在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生为了共同的创作目的互相协力合作的过程。通过这个合作实践，他们都认识到他们各自的研究如何能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互相影响并在更抽象的层次上获得共同性，而且这种共同性必须要赖以与他者之间具身体性的交流甚至是碰撞才能实现。

我认为这是“艺”字所含意义的充分体现。“艺”译为 art，古希腊语应该是 technē。这个概念通常被诠释为“技术”，但根据纳富信留介绍，其实，它同时也包含知识 (epistēme) 之意。<sup>14</sup> 回溯东亚传统，“六艺”表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它到后来也表示“六经”，但仍不失为某种身体性的道德修养相关的概念，正如《汉书·艺文志》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由此可见，“艺”字所含的意思远比知识的获得和增长更广阔且深刻。研究经书的目的在于“道”。但“道”并不一定就在于形而上的玄境。其实，道也不过是我们流转不已的生活过程本身。读书以资生活，做到身体力行，才是“学以成人”，也是“教养”概念所在追求的理想。所以，无论“艺”还是 art，都可以容纳比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丰富的内涵，或者是说，我们的理性知识有待提升到“艺”的高度，技术至上的时代尤为如此。在此时代，我们若还要试图以人性来控制技术，共同求善，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到“艺以为学”：在身体与心灵、情感与理性、技术与知识、法理与礼仪并行不悖的综合生活中“学以共同成人”才是应走之路。<sup>15</sup>

东京大学东亚艺术书院成立以来三年的探索之路大致如此。还有一点尚未谈到的是我们的运转经费的问题。近年来，日本经商界中 liberal arts 的呼声愈来愈高。在全球大变动的时代条件以及自 1990 年代陷入长期低迷状态的情况下，财界人士努力寻找新的思想观念。但这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内成就的。追

---

<sup>14</sup> 中島隆博、石井剛、納富信留、大石和欣、田辺明生、成田大樹『EAA Forum5 アー  
ツの再定義』、東京大学東アジア藝文書院、2021 年、p.6。https://www.eaa.c.u-to  
kyo.ac.jp/publications/eaforum-5/

<sup>15</sup> “学以成人”为 2018 年北京世界哲学会议的主题。“学以共同成人”系笔者借以发挥的新词。东亚艺术书院院长中島隆博提倡将人的界定从“human being”改为“human co-becoming”（详见中島隆博「Human Co-becoming 超スマート社会を支える人間観の再定義」：https://www.hitachiyoron.com/jp/column/ei/vol07/index.html）笔者该词的创意直接来自于中岛这一概念。

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和以 liberal arts 为标志的人文智慧如何相遇？东亚艺文书院的成立得益于企业对东京大学的捐款，也就是东亚艺文书院的运转是以产学合作的模式下得以实现的。在日本，企业和大学的合作一般都在技术研发方面，如此大规模支持人文研究教育的例子尚无前例。这说明，企业和大学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共识：双方都感到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认为很有必要共同面对人类当今受到的各种复杂挑战。大学，尤其是以 liberal arts 为基础的教养教育和跨学科研究可以也应该做到新的想像力和新的语言的孵化空间。或者说，大学是一个智慧的公地（commons）。国家、企业和社会力量应该携手维护并培育这一公共财富。东亚艺文书院是日本社会这种新型动向的一个小小体现。我们通过今后的不懈努力与实践，证明产学合作在这个意义上的现实价值。任重道远，但一高时代诞生的“教养”概念，在我们的如此努力之后，定会克服哲学家们曾经诟病的缺点，而成为真正做到牵动社会改进的实践智慧。只有这样，大学才能为人类幸福和平、世界万物繁荣共处做出真正伟大的贡献。

（原载《希哲 哲学杂志》第 5 期，2022 年）

## 发言者与作者简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以 2021-2022 年为准。

###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 丁夕友**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党委副书记  
**李泊桥**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  
**李猛**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教授  
**刘建波**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孙飞宇**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

- 高山花子** 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特任助教  
**铃木将久**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柳干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  
**石井刚** 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副院长、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田中有纪**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  
**张政远**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

###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 甘阳**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  
**李睦**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李震**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助理教授  
**刘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赵晓力**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 张锦少**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辅导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



## 编者

石井刚（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EAA Booklet 31

EAA Forum 21

大学“书院”教育模式的经验与思考

[2021年6月21日／2022年3月16日]

著者 丁夕友 李泊桥 李猛 刘建波 孙飞宇  
高山花子 铃木将久 柳干康 石井刚 田中有纪 张政远  
甘阳 李睦 李震 刘晨 赵晓力  
张锦少

発行日 2023年3月23日

発行者 東京大学東アジア藝文書院

編集協力 田中有紀（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  
郭馳洋（東京大学東アジア藝文書院特任研究員）  
立石はな（東京大学東アジア藝文書院特任研究員）

デザイン 株式会社 designfolio／佐々木由美

印刷・製本 株式会社 真興社

© 2023 East Asian Academy for New Liberal Art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SSN 2435-7863



# EAA Booklet - 31

EAA Forum 21

大学“书院”教育模式的经验与思考

